
【特别推荐】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科学统一..... 张星星（1）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10）

【本期关注】

驳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齐德学（14）

揭开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尊重”史料的假面..... 侯西安（20）

【亲历者说】

让历史和理论插上翅膀

——访中共党史文献著名学者陈晋同志 王桂环（23）

参加援建中尼公路纪实..... 曾序勇（28）

【史海烟云】

坚持“两条腿走路”实现中国战机跨代起飞..... 徐秉君（33）

从“万里长江第一桥”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完颜文豪（39）

2月15日印刷

第11卷第1期

【人物春秋】

周恩来倾心指导中国“上天”事业……………房士鸿（45）

刘少奇调研求真话……………姚 远（46）

【海外反应】

海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述评…周文华 董 莹（49）

【报刊荟萃】 ……………（56）

△改革开放40年意识形态工作的历
程与经验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40年

△中国税制改革40年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
的关系

△新中国留学归国政策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

△广东省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

△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的主要成就

△1949年后我国对西南边防的治理

△我军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经验

△中美建交与亚太秩序革命

△1953~1955年中缅关系的改善及
其影响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6期要目及摘要……………（61）

【特别推荐】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与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科学统一

张 星 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科学统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深刻认识党的基本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统一，对于我们以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死扭住不放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迷误，党和国家在一个时期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社

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受到冲击和破坏。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74年11月听取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精神，邓小平在1975年3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全国都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摆在“大局”的位置，要求全党全国都要讲大局、抓大局、从大局出发，实际上表达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条件逐渐成熟。邓小平发展了关于“全党抓大局”的思想，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9月，他“在

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赞同，也得到同年11月至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全会正式决定：“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公报重申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全会的这些重要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邓小平对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要“死扭住不放”。1979年10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从

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他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而这种认识和信念来自他对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理论和实践、经济和政治等重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

第一，“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邓小平深刻总结了1957年以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这是他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历史依据。他曾经谈道：“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根据这一历史教训，他强调指出：“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第二，“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

了”，“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邓小平对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历史原因，作了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他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当时的这种差距，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第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科学分析基础上的。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根据这一分析，他反复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开创我国外交新格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他指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坚决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第四，“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时谈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

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和信念，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对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他针对当时我国生产力较低和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的现实情况，尖锐地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他还强调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一个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点，为探索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石。

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果断地作出了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会议明确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改革开放的决策和逐步展开的实践，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新篇章，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第一，“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根据这一分析，他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

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这是邓小平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地阐述改革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200多名代表对我国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经济管理体制、内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深刻阐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初步提出了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他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同时严肃地指出：“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具体阐述了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管理方法、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革的初步设想，并就改革的方法提出了允许和鼓励进行试验的思想，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这一思想对推动在改革中大胆地进行试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着重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任务：一是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权，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二是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三是坚决实行

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 and 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四是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会议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尽管当时提出的这些改革任务还只是初步的，然而，“判断历史活动家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吹响了改革的进军号。

第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早在1975年领导整顿期间，邓小平就主张“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将其称为“一个大政策”。1978年3月，他批评了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片面理解，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同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期间又谈到，我们“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0月，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

了《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其中提出，要摆脱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变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这就使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邓小平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会后不久他就邀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在谈话中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1979年10月，他针对一些同志对吸收外资的疑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他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政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随后，他又进一步把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直接联系起来，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它冲击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系列“左”的政策，为经济建设的快速展开辟了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二十

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基本点，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动力。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左”倾错误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主流。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和警觉的问题：一些同志由于未能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也有一些人利用党纠正自身错误的机会，打着所谓“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力散布种种怀疑乃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特别是后一种思潮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其核心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煽动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报刊，在全国各地串联，甚至还同境

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视而不见，甚至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面对复杂形势，邓小平在坚定地领导全党进行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同时，以战略家的敏锐目光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觉察和指出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我们党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体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这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艰苦奋斗历程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对比，得出的历史结论和必然选择。“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邓小平指出：“每个

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行动准则，他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进行宪法修改工作之际，明确提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修改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原则的内容写入了宪法修改草案。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使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的活动准则”，成为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即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和我们党对自身错误的拨乱反正，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缺乏政治经验的同志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和混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散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清醒，不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人民民主专政，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后来曾

深刻地指出：“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这种保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再次是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发展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纠正了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观点和政策，努力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不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体现了它与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实践证明：“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

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他对当时出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软弱无力等问题，多次提出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又十分警惕和注意把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政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不断克服了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他指出：“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他深刻阐明了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指出：“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他同时也阐明了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致性和相互贯通，强调“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为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尽管“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但是，把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命题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立国之本，这是邓小平对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构成了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另一个重要基本点，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和阐述关于“两手抓”的思想。1979年6月，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的思想，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980年，他多次提出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对各种犯罪分子和犯罪活动给予坚决打击。198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从指导方针的高度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7月4日，他再次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

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阐述了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大会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报告强调指出：“只注意后一手而怀疑前一手是错误的，只强调前一手而忽视后一手是危险的。对这样的方针，全党同志必须十分明确，不应当有丝毫含糊。”这标志着“两手抓”方针的形成和确立。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是邓小平正确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卓越领导艺术，贯穿于他在新时期的全部领导工作之中。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清楚地体现了“两手抓”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例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也要保证必要的集中，强调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坚持自力更生，警惕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同时也要维护安定团结，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方针，同时也要对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要改善党的领导；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分清历史是非；要反对“左”的错误，同时也要纠正

右的倾向，“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邓小平关于“两手抓”的指导方针，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期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除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外，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整顿党的作风，“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阐述了关于“总体布局”的思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从“两手抓”到总体布局，是正确处理 and 解决事关我国社会主义方向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法宝，必须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过程。

坚持“两手抓”和总体布局，必须正确把握“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打击犯罪活动等，都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可靠保证，以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健康发展。不能因为强调“两手抓”，就忽视或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而要服务于和服从

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清醒的认识。1980年1月，邓小平深刻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他正确解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卓越领导艺术，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相统一的指导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能否全面地正确地坚持贯彻这一方针，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摘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6期，原文约13000字）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

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相关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1995）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在上百位经济学家对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争论最大的是，我国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有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认为中期改革应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种主张中期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转轨，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种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即

“两条主线论”，认为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应协调配套进行。今天看来，“两条主线论”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是有效的，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的历程，总体上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

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第一条主线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and 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允许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利用外资，建立新体制的所有制基础。总之，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

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后，最早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格局的动因，是为了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面对巨大就业压力，会议提出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报告指出，“各地可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尽管有种种限制，但它毕竟为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

私营经济接踵而来。个体经济一发展，私营经济必然接踵而来。对于雇工经营，开始国家是有限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人们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逐渐明确。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中国私营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发展了。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私营经济发展迅速。

引进和利用外资。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主要是办经济特区和引进与利用外资。对于兴办经济特区和利用外资，界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提出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但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特区头几年就做出成绩。1982年深圳特区工业产值达到3.6亿元，1983年跃升至7.2亿元。邓小平听到后，非常高兴，在1984年1月26日考察深圳时，挥笔题写了“深圳

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支持和领导下，从经济特区到全国，利用外资逐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越来越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响了第一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取得很大进展。截至2017年底，国有企业（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已达160.5万亿元，上缴税费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1/4，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1/5。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54.5万亿元。2016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上榜的国有企业增加到83家。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命题。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今后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的主要任务。

第二条主线：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主要包括以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价格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格改革常常走在各项改革的前列。1985年起,中国价格改革就以放开价格为主,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特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商品市场呈现繁荣景象,上百种票证相继被取消,到1998年终于形成了期盼已久的买方市场格局。到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均已达95%以上,各种服务价格也已大部分放开,说明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已实现市场化。

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在价格改革大步推进的带动下各类市场蓬勃发展。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各类市场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从行政部门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第三阶段为2002~2012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构建开放型现代市场体系。第四阶段始于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争取到2020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改革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底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经济搞活了,微观经济主体有活力了,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才

能使整个经济稳定健康运行。在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是成功和有效的,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在增长,没有一年出现负增长。1979~2017年近40年,GDP以年均9.5%的速率快速增长,而CPI年均上涨率不到5%。这是一个绝佳的搭配,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保持经济总体稳定的条件下取得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

宏观经济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一方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进行“放管服”改革,克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努力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保护环境等工作。这样做,就能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两个重点的规定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两条主线论”符合上述两个重点的规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今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着力点,包括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非公经济财产权、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等。与此相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等。

今后经济改革的另一重点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面也有新提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对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宏观调控体系在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手段协调融合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提价格政策，同时增加了区域政策。我体会，这是因为近几年价格改革进展较快，截至2016年底，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因此已很难运用价格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而区域政策日显重要，中国那么大，区域协调发展是优化重大结构的内涵，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正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次专门提出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是很重要的。货币政策一般主要关注物价稳定，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变动一直有争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物价是稳定的，但是金融并不稳定，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危机爆发后的反思认为，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只有关注物价稳定的

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宏观审慎政策。2017年7月14~15日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所谓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将各项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包括跨境资本流动、住房金融等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目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最后简要说说“两条主线”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的。所有制的调整 and 改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社会形成多元的市场主体，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运行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发挥优势，取长补短，在市场上平等竞争，能够较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此同时，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能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竞相发展。中国40年市场化改革使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越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市场化改革越深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越能完善和成熟。

“两条主线”没有主次之分，同等重要。它们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小标题后，接着就说“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说明这两个重点都是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下沿着上述两条主线展开的。（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原文约16000字）

【本期关注】

驳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齐德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指向是否定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篇文章，一是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后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的《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以下简称为《是非和得失》），二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的《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以下简称为《教训》），三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以下简称为《得与失》），后两篇文章是同一作者，并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申明用了《是非和得失》的材料。以下将此两篇文章作者称为“两文作者”。这三篇文章有一个总观点，即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错误的，是毛泽东推行世界革命的产物，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打起来的；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为了推行世界革命；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等等。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确如上述文章所说的这个样子吗？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朝鲜战争爆发与毛泽东有关系吗？

“两文作者”在《教训》一文中说“金日成南下是斯大林同意在先，但他又把决

定权交给了中国。只要中国稍微具备一点独立自主精神，不完全‘一边倒’，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就有充分的理由，用委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可是毛泽东一条也没提。”在《得与失》一文中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在1994年俄罗斯公布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以前，西方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有人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合谋的产物。在俄罗斯公布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以后，再见不到西方学者有这种说法了。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除了“两文作者”外，未见其他学者有这种说法，即便是对抗美援朝战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未见有这种说法。“两文作者”的这种说法可谓一个“独创”。那么“两文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事实吗？暂不论毛泽东是否“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先说朝鲜战争的爆发，能与毛泽东扯上关系吗？

了解朝鲜战争的人，几乎都清楚，朝鲜战争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及复杂成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两国

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一分为二，分别在朝鲜三八线以南或以北接受日军投降和实施占领，就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祸根。第二，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造成朝鲜南北分裂和对立，构成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第三，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府成立后，在如何实现统一和统一于谁的问题上的斗争，是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第四，1949年以来朝鲜南方不断在三八线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据朝鲜北方的统计，1949年1月至12月，朝鲜南方在三八线上进行军事挑衅共计1836次。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内战已不可避免。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朝鲜半岛北方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准备。同年1月，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根据变化着的半岛局势，考虑如何尽快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问题，并要求苏联政府给予支持。4月，金日成、朴宪永等朝鲜领导人访问苏联，斯大林同意了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随后，金日成、朴宪永又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于5月中旬访问中国，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通报了他们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1950年6月25日晨，三八线上长期小规模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质变，朝鲜实现统一问题的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

如此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毛泽东没有必然关系，无论毛泽东对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了的事同意与否，战争迟早都要爆发。那么毛泽东是否“积极支持”金日成南下呢？

历史档案材料已表明，在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朴宪永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通报他们与斯大林会商的结果之前，毛泽东对他们会商的情况一无所

知。毛泽东得知金日成通报他与斯大林会商决定了的事情之后，第一反应是表示怀疑，因此由周恩来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向斯大林求证，在获得斯大林的证实后，毛泽东表示同意金日成与斯大林会商决定的事情。金日成并没有告诉毛泽东将于何时采取行动，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最初几天，中国方面也未得到朝鲜和苏联方面的任何通报，而是从外电报道中得到消息。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毛泽东并不是“积极支持”金日成南下，而是无奈表示同意，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其二，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他与斯大林会商决定的事，只是按斯大林的要求走了一下程序，而对毛泽东表示同意与否，并未认真当回事。“两文作者”在《教训》一文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两文作者”说，毛泽东可以有多种理由不同意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的事情，“可是毛泽东一条也没提”。这也是“两文作者”毫无道理的指责。其一，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行动，虽与中国相关，但这毕竟是朝鲜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毛泽东凭什么要推翻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了的事情？其二，金日成向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明确表示了，“莫斯科已经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给了他所需的一切援助”，不需要中国提供任何援助。那么，毛泽东凭什么要推翻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了的事情？其三，中苏两国已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是盟国，苏联已决定的事情，毛泽东凭什么要推翻？

从以上事实和分析，不难看出，“两文作者”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结到毛泽东身上，纯属是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

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为了 推行世界革命吗？

“两文作者”在《教训》一文中说：“在决定抗美援朝的同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其实这只是为了说服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一种策略手段。”“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是非和得失》一文将毛泽东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动机和目的归结为如下三点：“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里虽对第三点加了“特别”二字，但作者真正强调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

分析一下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以上观点便不攻自破。

中共中央为什么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当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起决定性的因素无过以下三条：

第一条，直接原因。就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0年10月1日，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致函毛泽东的形式，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正是因为有了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在10月2日、4日、5日三个下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讨论援助朝鲜问题，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统一了认识，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第二条，根本原因。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在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时，无不首先考虑维护本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当然也不例外。（一）维护国家主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就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对此不能没有反应，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之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考虑可能要被迫同美国打一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二）保卫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飞机于1950年8月27日起，即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乡村，9月底10月初其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安全。故周恩来说：“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三）维护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能安定生产。”毛泽东也讲过：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们就不能安心生产。（四）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美国出兵朝鲜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

会稳定。(五)着眼于国家长远建设的考虑。如果不出兵,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需要部署很多兵力,还要改善装备和修建机场,随时准备打,与其如此,从经济上说,从国家长远建设上说,迟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第三条,军事准备因素。即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临战训练。由于毛泽东敏锐的局势洞察和战略远见,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在朝鲜人民军作战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中国于1950年7月7日就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边防军的全部准备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的。这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以上三条原因,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缺少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出兵援朝决策都难成立,或即便出兵也不会是这种形式和这种规模。

除此,还有三个因素,对出兵决策也有作用。

其一,历史因素。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当局仍然敌视中国人民,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但是,这一条无论如何构成不了毛泽东要“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

其二,意识形态因素。就是朝鲜和中国同属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朝鲜有难中国有责任帮助他们。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劳动党许多党员和朝鲜群众参加过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唇亡齿寒,户破堂

危。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邻邦而仅仅与中国一样是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恐中共中央是不会作出出兵决策的。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意识形态因素绝对不是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

其三,苏联因素。一方面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出兵援朝会有苏联作为后盾。这一点,斯大林有明确的表示。另一方面苏联在对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确有压力,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绝对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在中共中央决策过程中,斯大林曾积极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在中国要求其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时,他动摇了,说苏联空军未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并说,如果没有空军掩护,中国出兵困难,也可以不出兵。当然苏联除不兑现出动空军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的承诺外,中国要求的其他援助苏联基本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的因素、意识形态因素、苏联因素,这三条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出兵时考虑的因素,但都不是决策出兵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

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也就是说，出兵抗美援朝，是出于维护中朝两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这是某些学者为了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为了诋毁毛泽东，而完全不顾事实的妄断。与此相反，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却从未见到这样的说法，并且美国的一些客观学者，在谈到中国决策出兵时，都充分肯定了中国决策出兵的合理性。最为典型的是亨利·基辛格，在其所著的《大外交》一书中说的：“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相反的结论。”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 战略方针吗？

《是非和得失》的作者在文中专门用一个标题说“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列举的根据是引用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的一句话，“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是非和得失》的作者说“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这是事实吗？

第一，毛泽东究竟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什么样的军事战略目标？《是非和得失》的作者所说的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

针”，准确地说应是“军事战略目标”，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军事目的。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军事目的呢？在《是非和得失》作者引述这句话的同一电报中，毛泽东就讲了两种准备、两种可能。毛泽东的电报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就是电报中说的两种准备。接着毛泽东在电报中讲了两种可能：“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國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牌军队），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这就是电报中说的两种可能。况且，毛泽东这个电报没

有发出，也没有发给即将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东北边防军。而《是非和得失》的作者硬是抛开毛泽东讲的另一种可能不提，武断地说“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只能理解为该文作者是断章取义，别有用意。只要看到这个电报，《是非和得失》作者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毛泽东究竟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什么样的军事战略目标呢？根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有关电报、谈话、讲话等文献，中共中央的判断和估计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志愿军装备苏联武器并在苏联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有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种可能是建立在苏联曾承诺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基础上的。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前述未发出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就讲到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但有苏联武器装备援助，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3日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在1950年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中，都谈到了这种可能。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尽管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

联合进攻大陆。同时，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意。这是最不利的结果。在前面引述未发出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讲到了这种可能。

中共中央在得知苏联准备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后，认为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基本态度是以实现第二种可能为基点，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三种可能。

如果说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战略方针，那么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说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才真正是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的战略方针，并且是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战略指导总的、最根本的战略方针。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就是本着这个方针进行的。从这个战略方针中不但看不出有“超越现实”的问题，而且恰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古今中外，任何战争指导者在战争指导中，都是努力争取实现最好的结果，努力避免出现最不利的局面。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也不例外。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表明，在经过努力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实现战争最好结果时，毛泽东非常及时地调整军事战略目标。这是极为正常，极为“合乎逻辑”，无可厚非的事情。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完全实现了战略预想。《是非和得失》的作者，完全不顾这些事实，生生给毛泽东加上一个“罪名”——“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其目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不言

而喻了。

由此，不难看出“两文作者”也好，《是非和得失》的作者也好，为了否定抗美援朝战争，为了诋毁毛泽东，想怎么

说，就怎么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以期蒙骗和迷惑不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真相的广大读者。（摘自《军事历史》2018年第6期，原文约9000字）

揭开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尊重”史料的假面

侯西安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西方文化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剧烈。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蔓延更是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和制度颠覆的重要方式。它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贬低传统、歪曲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这种社会思潮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以后现代历史学等为旗号，而实质上是任意地曲解、割裂、涂抹甚至伪造史料，以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来割裂歪曲历史，从而达到借否定历史来否定现实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对于捍卫我国文化和制度安全意义重大。而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中，揭开其所谓“尊重”史料的假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其带来的各种挑战。

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 “尊重”史料

历史虚无主义对科学历史观最尖锐的挑战，其实是在对历史的“碎片化”解读中所深度隐藏的“伪史料”的传播。这种

挑战之所以尖锐，是因为“伪史料”以颇具蛊惑性的外观示人，而这一做法的荒谬性不易被发现和批驳。众所周知，“碎片化”本身是一个不包含历史评价意味的中性概念，比如对于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等。历史虚无主义在发现和整理新史料的时候，往往也自我标榜所谓的“价值中立”，试图把历史事实不带主观色彩地客观化呈现出来。在这些所谓的“历史呈现”过程中，直接的伪造历史还是容易被察觉核实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虚无主义以“碎片化”的方法对史料抽象地、非历史地进行显微放大或者刻意遮蔽，就会出现把“蚂蚁”变成“大象”，“大象”又会在历史中消失的情形。例如，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解放领导了解放战争，然而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蓄意歪曲和丑化这段历史，他们或将战争双方所采取的军事策略等同视之，或对战争中的死难者不加区分地致以同情或怜悯。再如，一些人出于各种目的，试图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妄图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地否定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历程。这种历史观的蛊惑人心之处，首先在于其

自我标榜的对于历史事件立场的所谓不偏不倚性；其次从史料的真实性来看，表面上好像抓住了一些现象，似乎没有造谣、污蔑和虚构历史，从态度上看好像还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这种叙述如果只从表象来看，好像尊重历史事实，貌似客观公正，大约很难被归入历史虚无主义。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何评价历史虚无主义的 “尊重”史料

如果仅仅从史料学角度来看，如上的叙述似乎没有什么破绽。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论来看，其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其一，所谓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对价值取向的更深层隐藏。我们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说明这一点。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战争双方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但所谓“价值中立”的偏袒却是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的。

其二，其所陈述的史料完全是“碎片化”的“私人叙述”，这样的史料从唯物史观视角看可称之为“伪史料”，因为这样的史料既没有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也没有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线的中国现代史的真实内容展开，并在这一展开过程中看到这个“碎片”所镶嵌的真实位置。作为一个掐头去尾、与其整体失去任何因果联系的“碎片”，这种所谓的“史料”已经完全丧失了真实“史料”的内涵。正如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所言，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存在……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可以获得它的地位。

这样的“史料”迷惑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真实”的外观。如果不掌握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就很难看破其“真实”外观背后“伪史料”的真相。其实，历史虚无主义者肆无忌惮地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污蔑人民领袖，抹黑英雄人物，以及在历史问题上把演义当历史，把八卦当真实，把恶搞当时尚，这些做派一眼就可以看穿，属于显性的“伪史料”。相较之下，具有真实外观的“碎片”史料则属于隐性的“伪史料”。它与显性的“伪史料”异曲同工，由于更具有迷惑性，因而更不易为人们所发现。

其三，其所陈述的史料以偏概全，把支流当主流，把部分当整体。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党史国史军史所依据的一些史料，有时也不太可能一概地认定是“伪史料”。但是这些历史事件所形成的史料，往往发生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特定时期。这样的史料认定似乎也符合科学性的原则，不存在抹黑和污蔑的问题，但这是一种逻辑学上的偷梁换柱和以偏概全。把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某些失误无限放大，完全遮蔽和抹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巨大成就，以及宵衣旰食、夙夜在公的伟大精神，就会完全遮蔽历史的主流与整体性。那种妄图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同样是用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来抹黑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否定改革开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功绩。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

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揭穿割裂历史的虚无主义言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南。

真正科学地重视和尊重史料

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以“尊重”史料为名偷天换日地贩运“伪史料”之实，但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对史料的合理尊重、细致挖掘和严密考证。其实，对于历史的合理性评价和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严密考证，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双翼”。只是在历史研究的不同时期，史学界可能对历史评价与史料考证关注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史料考证和细节关注，是为了揭穿其在价值客观性外衣深深包裹下的强烈的价值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怎么对于历史细节进行考证，事实上终极目标都是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抹黑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抹黑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和人民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在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变换手法进行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矢志不渝地坚持唯物史观，在史料考证和评价中坚决反对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歪曲或丑化历史，公开申明我们的人民立场。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既要对党史国史军史和改革开放历史中磅礴辉煌的宏大历史场景、人民领袖和英雄楷模的伟大事迹有所了解，又要进一步对宏大历史场景背后的具体历史情景和细节有所了解，以及对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有所了解。我们要揭开历史虚无主义伪史料的“面纱”，就要在理论批判的同时，关注人民领袖和英雄楷模为了国家的主权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具体、感人的真实史料，生动具体地展现伟大社会变革中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状况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比如，近日中央军委批准的全军挂像英模林俊德，他的模范事迹得到广泛传颂，其史料细节也被拍成电视剧《马兰谣》为国人所熟知。这样的史料传播使人们既看到人民领袖和英雄楷模的伟大之处，更通过史料细节展现他们的真实情感和普通人的一面。这样的真实史料的挖掘和展现，正是揭穿历史虚无主义伪史料假面的重要途径。（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27日，原文约3000字）

【亲历者说】

让历史和理论插上翅膀

——访中共党史文献著名学者陈晋同志

王 桂 环

采访者：研究生毕业后您就到了中共中央原书记处研究室，这段经历对您后来治学有什么影响呢？

陈晋：我被分配到研究室的文化组，开始关注文艺界、思想文化界的各种现象，研究现实问题，视野更广了。研究室的理论研究氛围很浓，比如说，文化组里有位叫陈涌的顾问，延安“鲁艺”毕业的，是很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曾被划过“右派”，一直关注现实文艺问题。他很欣赏后来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作品尚有争论的时候，他是力荐的。当时我们是研究室的小萝卜头，从头学习。领导告诉我，刚来不要贪大求洋，从校对文件稿开始，如果发现一个标点符号有问题，改过来了，那就是一个小贡献；发现一个字用错了，改过来了，就是一个中贡献；发现一句话错了，把它调整了，那就是一个大贡献。这话说得非常好，我终身受用。

还有一句话也是使我终身受用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的时候，室主任邓力群同志找我谈话时说：“你们还年轻，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工作，要做出点事情来，就是八个字：有事干事，无事读书。”也巧，后来研究毛泽东，发现他在延安劝一些老干部要善于学习，克服本领不足的危机，就打过一个比喻，说做事情就像开商店，你老是不进货，店子就开不下去了。今天看来，干事就是“出货”，读书就是

“进货”。这是在机关性的研究部门做好事情的真谛，也是我后来想到做《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这个项目的原由。

采访者：您是在什么机缘下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并且将兴趣从文学转向党史的呢？

陈晋：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别的中央机关部门，条件也非常好，可我就是一门心思想搞学问。正好，1986年我读到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本叫《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小册子，作者是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等前辈，发现毛泽东读了那么多书，里面还谈到毛泽东评论《红楼梦》等，跟我的专业很接近。我就给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的龚育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到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意思。龚育之同志向室里推荐后，1987年年底我就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从此，一干就超过了30年。

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理论组。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校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书稿。正好，我的几本文艺论著出版，那时出书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时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送给一些同志“批评指正”。室主任李琦同志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说：“陈晋呀，你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呀。”那时候喜欢拽新名词，就是新方法、新观念什么的。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深，从此开始了两个转变：一是转兴趣，立意研究党史文献，

特别是研究毛泽东；二是转文风，要学会写非学院派的文章。

在积累材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文献研究室找了三个年轻人来完成一本文献选编，我在里面。于是我就开始看毛泽东的档案材料，两年时间，从头看到尾，看了一个遍。看材料的过程很兴奋，越看越觉得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文章、气势，包括他的决策过程，都特别吸引人。看了两年多，我觉得该写点东西了。

我写的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长篇论文，叫《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及其文化性格》。因为心里没有底，就先请我们理论组的组长石仲泉同志把关，他觉得不错，1990年在《党的文献》分三期连载。好多人都觉得角度比较新，很多老同志都很支持我。龚育之读了以后，专门跟我说，你这篇文章很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个材料。他说有首词传说是毛主席写的，当时他在中宣部还考证过，也以为是毛主席写的，实际上后来查证是山东大学一个叫高亨的教授写的。我还把这个材料补充到了我别的书里面。后来就写得越来越多了。

采访者：您平时工作繁忙，但无论是领袖研究，还是文献纪录片都成果颇丰。您对毛泽东可以说研究得很深入，包括他的革命业绩、精神风格、读书日常，等等。和您谈话，感觉您对他的话语常常是信手拈来。做到这点，一定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积累过程，您能谈谈平时是如何做的吗？

陈晋：做研究，主要靠平时积累。而编辑党的文献，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本身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文献研究室编辑了那么多书，基本上是不署名的，背后不光是材料积累，也是研究积累。特别是对年代远一点的文稿，要考证，要

查明版本，还要写题注、注释等，很麻烦，其实这也是在研究。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久，就听说当时编一本毛泽东著作选编，为给其中一篇文献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参加工作的同志就写了几万字的考证材料，最后落实到正式文字上，也就80多个字。还有，为了弄清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一篇文稿中提到的是“茶油”还是“茶、油”，参加工作的同志不知查阅了多少文稿，还到井冈山实地调查。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编辑《毛泽东文艺论集》的时候，为了弄清楚毛泽东1938年一次讲话中提到的，关于徐志摩说过的“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的出处，我们把徐志摩的书，鲁迅的书，陈西滢的书，翻了个遍，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总之，我觉得文献研究室的日常工作都是在搞研究，至少是为研究积累材料、思路。我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自然也不会把工作和研究对立起来。对毛泽东的思想生平著作比其他研究单位的人熟悉一点，是很自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我的研究是建立在老一代党的文献工作者对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基础上的。他们扎扎实实地编了很多书，有的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没再写了，比较起来，我当时年轻，所以有劲头写写。在写作上，也是向文献研究室的老一代同志学习，比如逢先知、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等。对我们这些人，他们总是主动地“传帮带”，充满热情。

我们单位和社科院、大学做学问有所区别，每天坐班，有的工作确实是事务性的，大块的阅读和写作时间是没有的，主要靠自己挤时间。我的作息时间安排与这也有关系，真正搞研究或读书，都是在下班以后。平常九点左右到家，那段时间最安

静，注意力也集中。再就是出差旅途也很方便阅读。我个人对写作也有兴趣，有时候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采访者：您从文化的维度全面解析毛泽东，拓展了新的领域，能就您几十年的经验谈谈历史研究、毛泽东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吗？

陈晋：研究毛泽东卓有成效的专家很多，我是后来者，只是在具体领域有些心得。第一，做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领袖人物研究，有很多种切入视角。但无论哪种视角，都应该靠材料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时代在往前走的时候，总难免回过头来评价和研究毛泽东。这时候，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就很重要了。关于毛泽东，现在网上有不少议论，但有的议论不能算是研究。有的人是靠感觉，容易被情绪左右，容易被先入为主的感受左右。我们看了不少材料，编了很多书籍，考证了不少细节，得出的结论是以材料为根据的。比如就我参加《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这样的项目编撰来说，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不能保证把所有的材料都写上去，那也不可能，但凡是写出来的材料，都是要有可靠依据的，这是得出观点的一条底线，一个前提。当然，这也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给我们的一个恩惠，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但是一旦得到了这个机会，只要按照规律办事，写出来的东西，别人还是认可的。

第二，我觉得党史文献和毛泽东研究，是一个大领域，每个人都做到各种专题都精通，各个历史阶段都精通，每位领袖人物都精通，是不可能的。要在这个领域里驰骋，大概要处理好“根据地”、“制高点”和“长征”三者的关系。根据地就是基础性工作，比如写传记、写年谱，编各种综合或专题文献集等。此外，还要有

“制高点”，就是要有体现专长和学术个性的深入研究，要有带兴趣点的领域。我从文化性格、文化思想、理论个性、实践个性、人格个性这些角度切入，来研究毛泽东，大概也算是在寻找“制高点”。但是，如果总是固守一个“制高点”也不行，时代在变化，人们关注的热点也在变化，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从根据地出发，利用在制高点上积累的优势，进行“学术长征”，开辟新的根据地。“学术长征”是最考验水平的，最显功底的，最显创造性的，而且这是一个无尽头的研究过程。总体上来说，“根据地”、“制高点”、“长征”的关系，就是“由博入约”和“由约入博”的两个过程。

第三，就是“让历史插上文学的翅膀”。党史文献研究要走得远，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扎实研究，得出惊世骇俗的史实结论或者是紧扣时代的理论新见。一种是善于把自己的见解以信达雅的方式呈现出来。通俗晓畅还要雅致地表达，这就是个学术翅膀，有了翅膀，观点会“飞”得更远。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难道不是一篇美妙的散文？所以，我一直主张让历史插上文学的翅膀。老一代的大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学素养很高的。党内的大理论家，被称为“二胡”的胡乔木、胡绳，他们的文字就不一般，读起来就是有味道。党史文献研究，一定要“把有意义的事讲得有意思”。有意义的人物、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讲出味道来，这样的话别人接受起来才容易。研究的目的是让人阅读、接受，党史也好，毛泽东也好，那么波澜壮阔，那么丰富生动，本来就有魅力，如果文章传达出来是毛泽东一向反对的“八股”面目，那岂不是对不起他们了？

总之，材料的角度，领域的角度，插

翅膀的角度，我想应该是党史文献研究需要认真讲究的。

采访者：您是著名的文献纪录片撰稿专家，创作了大量精彩的文献纪录片，从《毛泽东》、《邓小平》到《大国崛起》、《筑梦路上》，一步一个台阶。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转向文献纪录片的呢？

陈晋：说起来，真有点像前面讲到的，属于“学术长征”在起步时的一场“遭遇战”的结果。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电视界很多人都在做纪录片。最早是有一家出版社想搞个纪录片，找到我的同事吴晓梅，吴晓梅报告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这样单位就派她、张民和我三人参加。三个人一块写，关在宾馆里面写了一个月。后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刘效礼主任他们也在搞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电视片。他们觉得全国研究毛泽东的权威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就找到单位想跟我们合作，这样一来，我们两支队伍就自然而然地合并在一块了，发挥双方在电视制作和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优势。我们此前写的稿子，自然也作废了，不符合纪录片的要求。这样，我就算第一次“触电”了。

那时候做纪录片，写稿子也好，采访也好，编初编带也好，编导和撰稿都是在一起磨的，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啊！我们写了稿子以后跟编导讨论，编导指出不足，我们再慢慢修改。过程是既愤怒又愉快，愤怒是说当时我们是从研究的角度，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争论完了，就又是好朋友。大家一块熬夜，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出油，什么是流汗了。夏天热，白天流着汗，晚上熬夜干，时间长了，一抹脸，脸上光光的，都是油。饿了就煮方便面，那时方便面时兴，大家觉得也挺好吃。愉快是说确实学

到了很多东西。做完《毛泽东》，我大概就知道文献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了，在怎么写解说词问题上，向编导学习了很多经验。比如去中南海拍毛泽东故居，从大门进去，沿着走廊走一圈，然后走到菊香书屋，整个是一个长镜头。编辑的时候，编导说得有点语言，就让我来写一段话，我就写了一段，结果编导说画面在运动，语言不能是结论性的，观众这时最想看清楚毛泽东当时住的房子的样子。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语言要有代入感。

比较顺利的是，我以前是学文学的，把这个特长用在文献纪录片撰稿上，转型不算太陡。事实上，也是在做“让历史和理论插上翅膀”的事情。

采访者：做了这么多文献纪录片，您觉得它的难点在哪呢？

陈晋：做电视纪录片的过程就是梳理历史的过程。历史题材的电视纪录片，我们叫它文献片，后来又发展出理论文献片。今天，这种片子一般人不愿意搞，或者说不大好搞。为什么呢？它对综合素养要求较高。首先，要有史家的眼光和感觉，对历史有个正确的把握，有历史宏观上的高度。还要有观点。第二，要有专家的素养。要有历史素材的研究和积累，根据主题的需要，你要会把掌握的素材恰当地拎出来。第三，要有文学的情怀和感觉，叙述人物和历史，重在还原和塑造。第四，还要有电视化感觉，跟写文章不一样。既不能看图说话，也不能游离画面。语言要高度集中，有时候一句话要概括好多事。因为画面不像我们说话可以无限制，有时候一份资料的历史镜头，只有几秒长，需要你高度简练而又生动的词句，把这个历史素材的魂勾勒出来。所以做电视纪录片的过程，就是考验你的历史认知、研究素材的积累的过程，同时也考

验你把研究成果转化成艺术形象的能力。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研究。

采访者：看您的文献纪录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您用散文语言来描述历史，把历史与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您主张“让历史和理论插上翅膀”，那您平时的写作过程中是如何将二者融入在一起的呢？

陈晋：就两条，一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把历史和文献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写作过程中注意用词的节奏和畅达，要反复琢磨语言。我写文章很难一气呵成，一般要改好多道，最后还有一种边写边默念的习惯。念到哪个地方，觉得拽词了，或者有点拗口了，都要想办法修改过来，在交稿前我还要再顺一遍。但即使这样，有的文章还是不理想。再就是对材料的使用要讲究，不一定要大段大段地引用文件。用多少，从哪个角度用，才会和文章的主题扣得紧，要想清楚，不是为了用材料而用材料。有的文章，先提炼出几个概括性的论点，然后每一个论点下面就是材料引文的罗列。这当然也是一种写法，效果如何，值得考虑。

我觉得应该把材料放到观点里面，很自然地带出来分析。比如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指导作用角度，来引用这句话，最理所当然。但如果要写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方面的文章，引用这句话，就需仔细琢磨其中的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学会，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什么是“学会”？恐怕不是简单地引进或拿来照做，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善于结合，才叫“学会”。什么是“被动”？照搬，简单地学别人。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之前，中国人寻找的道路不成功，因为是“被动”地照搬西方。即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了，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那些年里，由于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上也是“被动”的，所以在实践中走了弯路。什么叫“主动”？结合完了，走自己的路了，创造性地按照自己的路线来干，这才叫主动。没有精神上的主动，就没有新道路的开辟，就没有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在某个时候某件事上精神上主动自信，未必能保证在其他时候、其他事情上永远如此。这样解读，就跟文章的主题联系起来了，从而说明我们今天在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提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采访者：您能从选择方向这个角度，给年轻一代党史文献研究者提几点建议吗？

陈晋：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是热门“显学”，现在是“常学”。显学是全社会都关注，常学是经常要用的一门学问，但是不一定大家都去关注。今天搞党史研究，恐怕要有一种做“常学”的心理准备。

“常学”好不好？好！社会变化很快，实际上我们往前走，现实总会带来些矛盾，带来些不安，带来一些对未知的焦虑，这是必然的。于是，人们就难免回头看一看，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怎样才能走得更好。这是历史进步带规律性的现象。但往回看不是往回退，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毛泽东就有句话，看历史会看到前途。意思也是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一路的风景如何，有什么坎坷，最后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去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常学”的价值所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明

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些大的历史节点上，党史这门“常学”发挥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党史还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一定要有现实感。什么叫现实感？主要是研究至少应熟悉当代理论，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采访者：对于刚刚入门的年轻一代党史文献研究者，您觉得该如何尽快提高专业素养呢？

陈晋：我提不出什么像样的见解，不能好为人师。如果从自己的感受角度讲，刚入门时起点要高些。所谓起点高，一是熟悉材料的起点要高。高在何处？高在要看权威材料，如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党史文献集，以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等。再就是看前人的研究著作的起点要高，高在要读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著作。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卷、二卷这类大部头的书，花功夫从头读到尾，会有好处。虽然刚开始读了可能印象也不是很深，但是能够帮助积累党史概念，感受一种话语体系，或者能够从中发现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根据地”。其

实，今天入党史行的年轻人，远非我们当年能比。他们的学术背景远比我们丰富，阅读基础也比我们扎实，汲取材料的方式也宽阔得多。我说的，多少是好为人师的老生常谈。

但有一种体验，也许有共性。王阳明说过，人在事上磨。做的事情多了，慢慢就积累了。如果老是想，但是不去做，再聪明的人，成就都是有局限的。做的事情多，辛苦一点，一件件做下去，一篇篇文章写下去，一个个项目研究下去，留在脑子里面的积累就多了，到一定程度，许多思考也相通了。剩下的，无非是在需要的时候，怎样把它拎出来的问题。王阳明龙场悟道时，还只是一个概念。悟道时他在贵州当小官，经历了不少事，后来又江西剿匪。再后来，他能够独具慧眼看出宁王有野心，不跟他合作。宁王造反后，在没有朝廷及时部署和支援的情况下，他主动作为，招募兵佣，三下五除二就把事件平掉了，这些都是磨出来的。这么多磨砺之后，他又总结，开堂讲学。所以他的学问，属于知行合一的学问。（摘自《北京党史》2018年第6期，原文约12000字）

参加援建中尼公路纪实

曾序勇

“共产主义不会用汽车运进尼泊尔”

修建连接拉萨到加德满都的中尼公路，是中尼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对两国都具有战略意义。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有着传统的友好交往，但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妨碍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和人员往来。修建一条现代化公路，将极大地改善中尼交通运输，便利双方人文交流。从中国方面来说，西藏对外的唯一通

道和出海口是从亚东口岸出境，经锡金至印度加尔各答。但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这条陆路通道被完全关闭了。中方需要开辟一条新的通向南亚的对外通道。尼泊尔是位于中印两大国之间的内陆国，在经济、贸易、防务等多方面受制于印度，为维护自身独立、抗衡印度的控制，需要加强尼中关系。但是，修建中尼公路曾遭到一些外国势力的反对。对此，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顶住压力，公开反驳说“共产主义不会用汽车运进尼泊尔”。中尼公路的中国境内段，从拉萨到聂拉木714公里早已修通，仅聂拉木至中尼边界40余公里路段尚在修建之中。尼境内从加德满都至中尼边境小镇科达里全长114公里（尼方称为加德满都—科达里公路），由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双方合作修建。

1963年中尼双方签订协议后，中国政府即派出专家组到尼泊尔实施勘察、设计、施工。中国专家组在尼泊尔公路局配合下，招收当地工人组织施工。这条公路靠近中尼边界的二三十公里路段（从科达里至巴拉比斯），由于地形复杂险峻，应尼方要求，经毛泽东批准，中方派出工程兵部队到尼泊尔独立完成，没有尼方人员参与。为了避免外媒炒作“中国军队进入尼泊尔”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引起外界误解和猜疑，中尼双方商定，中国赴尼修路的工程兵部队称为“中国筑路工程大队”，一律不穿军装；一律不用军队编制和军衔。当然这支部队不仅不穿军装，也没有任何武器，他们随身只带着筑路工具和器材。

从拉萨到樟木

1964年2月，我接到上级通知，要

我随中国筑路工程大队赴尼泊尔修建中尼公路。我从拉萨出发，乘坐一辆西藏军区的运货卡车，经过日喀则和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的沙石公路上颠簸了两天，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到了聂拉木。聂拉木是与尼泊尔接壤的边境县，是传统的藏尼通商口岸，尼泊尔在这里设有商务代理处。随着中尼公路向中尼边界延伸，聂拉木口岸正准备搬到离边界更近的樟木。第二天，我转乘一辆顺路的军用吉普车去樟木。从聂拉木到樟木约30公里，已建成不到10公里，其余大部分路段还在修建之中。吉普车沿沙石公路下行不久，就到了仍未完工但已经初通的路段。这段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又是蜿蜒曲折的盘山路，急弯很多，十分危险。

我坐在吉普车上，紧紧抓住扶手，以防因车子剧烈颠簸头撞到车顶铁条上。车窗外，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幽深峡谷。吉普车在狭窄的盘山道上下行，感觉半个车轮都悬在路边，心情很是紧张。而这里的山位于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从海拔4300米高的聂拉木到2300米高的樟木，约30公里的路，高度却陡然下降约2000米，山势险峻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喜马拉雅山的雄伟和大气磅礴。另一个强烈感受是自然环境和色彩的巨变。吉普车拐过一个山崖，突然眼前变成一片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岭深谷。山谷中波曲河流水潺潺，到处绿荫葱葱，公路边多处泉水飞瀑。这同冰雪覆盖、一片灰黄的西藏高原判若两个世界。这里山风不再寒冷，空气清新湿润，呼吸变得顺畅。在极短的时间里前后景观如此迥异，色彩的转换如此强烈，真是难以想象！

车开到半路就无法前行了，因为前方路段正在爆破施工。我只好下车，背上自己的行李，离开公路沿着陡峭的山路徒步

下山。其实许多地方并没有路，只有来往行人踩出来的小路。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到了樟木。

背着行李徒步走到尼泊尔

第二天，我和中国筑路工程大队的人员背着行李、帐篷、炊具、筑路器材等，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山下走。沿途不时碰到尼泊尔边民，他们背着装满货物的竹筐，竹筐的宽带套在额头上，一步一步吃力地往山上走。从樟木到中尼边界友谊桥有13公里。我头一天背着自己的行李到樟木已经走了几个小时，腿本来就有些酸痛，这天下山10多公里又走了两三个小时，两腿更加酸痛，几乎要走不动了，但终于到了友谊桥。

友谊桥是横跨波特科西河的边界木桥。波特科西河是樟木与尼泊尔之间的界河，河中乱石林立，湍急的河水从山间峡谷奔腾而下，撞击出许多白色的浪花。我背着行李，迈着沉重的步伐，跨过友谊桥的中心线，进入尼泊尔国境。

从友谊桥到我们的宿营地还有一二公里路程，但短短的这段路却成了最艰苦的旅程。感到背上的行李越来越重，两腿则越来越使不上劲，沿着湿滑的羊肠小道艰难前行，一边是陡峭的山坡，一边是湍急的河水，十分危险。如果滑到河里肯定就没命了，我不敢往下看，只能小心翼翼地沿着不足一尺宽的泥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心里默念着“坚持就是胜利”，最后终于到了科达里半山坡上的宿营地。

我们的宿营地就是筑路工程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离大队部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尼军边防哨所，有士兵昼夜站岗。哨所前有一条小路通向中尼边界友谊桥。中

尼公路修通前，这里是去友谊桥的必经之处。大队部有三四个白色帐篷，搭在半山坡平整出来的土地上，帐篷四面用绳子固定在木桩上。

住在大队部的有李大队长、副大队长、王秘书等大队干部。我和王秘书住一顶帐篷。

异常艰险的筑路工程

工程大队进入尼泊尔后，迅速投入施工。工程大队下辖四五个中队，五六百人，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地段施工。第一期工程是开通一条便道。由于靠近中尼边界一二十公里这一带都是崇山峻岭，工程异常艰苦。战士们把很粗的保险绳捆在腰间，拿着铁锤和钢钎，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方吊下去，一人扶钢钎、一人抡铁锤，在坚硬的岩石上打炮眼。炮眼打成后填上炸药，把岩石炸碎，然后几个人一起把大块岩石用铁杠撬下山去，小块的则用手一块一块搬走，不仅劳动强度很大，而且十分危险。除了悬空打炮眼、填炸药、安放雷管、排除哑炮（没有按时爆炸的炮）这些危险工作外，从悬岩上不知何时就会掉下来的石块，也时常威胁着筑路战士的生命安全。尽管大队领导反复强调安全施工，也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比如每天施工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悬岩和陡坡上因爆炸而松动的石头，但安全事故还是时有发生。有一次，我跟着大队领导到事故现场看过一位刚刚牺牲的战士。一块不过拳头大小的石头从山坡高处掉下来，砸穿了战士头上的藤编安全帽而导致这位小战士当场牺牲，我深为他惋惜。

在筑路工程大队工作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有4位年轻的战士为修建这段公路

而丧生，为中尼友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被安葬在樟木的烈士陵园。后来我去过樟木烈士陵园，得知那里安葬的数十位烈士都是参加修筑中尼公路（主要是国内段）牺牲的战士。这一段中尼公路基本上是沿着波特科西河南岸修筑，河对面就是西藏。我们住的大队部在公路上方数十米高的山坡上。每天下午收工前后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在山间回响。最大的一次爆破据说用了一吨炸药，炸掉了七八千立方米的石头。可以说，这段公路完全是用炸药炸出来的。

同两位司令的友好交往

我在筑路工程大队的主要工作是和李大队长做翻译。李大队长是工程大队的主要负责人，在国内是某工程兵中校团政委。我们同尼方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两位司令，一位是边防司令沙阿少校，他负责科达里一带的边防安全。另一位是警卫司令卡尔基少校，是尼政府为保证中国筑路工程大队的安全而专门任命的。他们住在离大队部百十米远的一栋平房里。两位司令对我们都很客气和友好，每次见面总是面带微笑，按尼泊尔的礼节双手合十主动问候说“纳玛斯德”（尼泊尔语“你好”）。李大队长对他们说，我们遵照毛主席和中国政府的指示来尼泊尔修建中尼公路，一定保证按时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让这条友谊之路把我们两国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上级要求我们尊重尼泊尔的风俗习惯，如果我们的人员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请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两位司令说，尼泊尔很穷，交通困难，你们来帮助尼泊尔修路，我们尼泊尔人都很感谢你们。在尼泊尔山区修路非常艰苦，你们工程大队不怕

苦，不怕危险，纪律严明，我们看在眼里，当地老百姓都竖大拇指，说“中国好”。我们同两位司令经常你来我往，有时请他们到大队部帐篷喝中国茶，有时去他们那里喝加糖和牛奶的红茶。偶尔也让厨师做几样中国菜请他们品尝。李大队长除了向他们通报筑路工程的进展情况，还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做了许多友好的工作，联络了双方的感情，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中国筑路工程大队在尼泊尔修路期间，从未发生过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或其他任何扰民的事情。科达里附近的公路边上，有个小有名气的地方叫“达朵巴尼”（尼泊尔语“温泉”之意），是个露天温泉，经常有当地的尼泊尔男人和妇女在那里洗澡，但他们都穿着衣服洗（男人至少穿着短裤），不是裸浴。我们的筑路战士尽管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汗，为了不扰民，从不去那里洗澡，而坚持在驻地用脸盆打凉水擦身。我们工程大队人员除了住处和工地，从不去当地老百姓家或附近的集市和商店。每次开山放炮之前，都要在可能受爆炸影响的区域内认真检查，确认没有尼泊尔边民或过路的人，以避免发生意外。工程大队修路所需的设备、器材和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是从国内运来，只有少部分食品、蔬菜从稍远的集镇或加德满都附近以市场价购买，对当地市场供应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为贫苦的山区人民看病

除了为大队长做翻译，我还有一项工作是给工程大队医生当翻译。工程大队有一位随队医生，专门有一顶帐篷是医务室，除了为我们自己的人员看病治伤外，

每周还抽出两个半天为当地尼泊尔人免费看病。他们大多是科达里一带山区的贫苦群众，很多人面黄肌瘦，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尼泊尔山区霍乱、痢疾、肺结核等疾病很普遍，但缺医少药，很多人从来没有吃过西药，针对他们的症状给点药往往效果是很好的。通过为医生当翻译，我第一次接触到尼泊尔山区的贫苦人民，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窘况。

工作上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我为新建的边界友谊桥题写了尼泊尔文的名字。原来的友谊桥是木桥，只能过人不能行车。我们工程大队在修路的同时，新建了能双向过车的现代公路拱桥，分别用中文和尼文写上“友谊桥”。我把中文“友谊桥”译为尼文，征得两位少校对译法的认可后，很认真仔细地参照尼文的印刷体字母，写好了尼文的桥名，然后由工程技术人员按比例放大写在桥上。大桥竣工后，每当我来到桥头，看见用红漆写的尼文“友谊桥”时心中就会漾起一丝自豪感，因为那是我为中尼公路做的一件小小的实事。

那年夏天，还发生过一件令人后怕的事情。在科达里往南几公里的地方的波特科西河边有个小村庄，工程大队一个中队准备搬到那里住。但就在头天晚上山洪暴发，把整个村庄十来户人家全部冲走了，原来是大雨造成山上的一个堰塞湖崩垮，形成了巨大的山洪。事后我们去现场，看到河中有许多被山洪冲下来的巨石，有的竟然比一间房屋还大。幸亏我们晚搬了一天。在科达里的生活总的来说还不算苦。吃饭同在国内差不多，但住的条件很差。我们的帐篷下摆离地面有半尺，是透风的。睡的竹棍床凹凸不平，背上感觉不怎么舒服。比较令人讨厌的是蚂蟥，这是一种比我国南方水田里的蚂蟥要瘦小一些的

旱蚂蟥，但同样吸血。外出走杂草丛生的山间小道，蚂蟥就可能爬到脚上，隔着袜子也能吸血，所以外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找脚上有没有蚂蟥。偶尔晚上睡觉时蚂蟥还会爬到头上，那就有点恐怖。

能有机会参加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尼公路，我一直认为是幸运和自豪的事情。这段经历，让我用所学的尼泊尔语为中尼友好做了点事，增加了我对尼泊尔的了解。年底，当我接到外交部的调令离开科达里回国时，心中不由漾起依依不舍之情。

参加中尼公路通车剪彩仪式

中尼公路（尼境内段）于1967年全线竣工。尼泊尔政府把这条路命名为阿尼哥公路，是为纪念尼中友好的使者、北京白塔寺的建造者阿尼哥。6月，在巴格塔普尔公路起点处（距加德满都13公里）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剪彩仪式。马亨德拉国王出席并剪彩。尼泊尔交通大臣和专程来尼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在仪式上讲话，盛赞中尼经济合作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当时我在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工作，参加了通车剪彩仪式并为双方讲话做了翻译。尼方讲话中特别提到中国派出筑路工程大队帮助尼泊尔完成了最艰巨的科达里路段工程，我作为参与者感到十分欣慰。通车典礼结束后，我国政府在边界友谊桥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招待会，尼国王代表、政府大臣、各界知名人士、外国使节等200余人应邀出席。中尼公路的建成和通车庆祝活动在尼泊尔引起巨大反响，舆论高度评价中国对尼的援助和中尼睦邻友好关系。（摘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11期，原文约6000字）

【史海烟云】

坚持“两条腿走路”实现中国战机跨代起飞

徐秉君

1978年，对笔者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笔者由一名普通战士提升为机械师，成为一名维修飞机的技术军官，从此与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被调到师、军及军区空军机关，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空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变革。1998年，笔者到空军某试飞部队任职，又亲历了中国第三代战机起飞的艰难过程。因此，作为一个亲历者，有义务有责任把自己参与的经历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展现和记录改革开放的这一成果。

邓小平：“空军要放在第一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军队工作重点也实施了转移。实际上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从而提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装备建设严重落后。这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列装三代战机，随后相继完成了三代战机的更新换代。中国飞机装备仍然停留在二代上徘徊不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代差。

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央军委适

时作出实施军事装备跨越式发展战略。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要下决心实行战略性的“重要的转变”。他在谈到中国空军发展战略时明确指出：“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从而把优先发展空军摆在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地位。

基于积极防御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加速建设“强大的空军”的新思路。集中在一点上，就是要在一段时间内重点发展空军。他着重强调，要在经费上倾斜，也就是说，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清先后缓急，优先发展空军。与此同时，基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邓小平多次指出：“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

然而，当时国家建设资金有限，要办的事情太多，如何平衡发展经济与建设国防的矛盾也是一个突出的焦点。关键时刻，邓小平强调指出：“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汇报时说：“无论如何，今后作战，空军是第一，陆海空军，空军要放在第一位，否则什么仗都打不起来。我倾向把投资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上，要取得制空权。”之后，他再一次强调：“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我们国家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坚持“两条腿走路”

军队建设实施重点转移以后，把飞机装备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储备，以及投入的资金捉襟见肘，因而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飞机装备的更新换代。国家安全急需与供给的严重不足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与经济封锁，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军事工业的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际形势也开始向“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转化，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未恢复正常化。为了从战略上制衡苏联，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尝试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这无疑给中国加快装备发展提供了机会。然而，我们有过20世纪60年代苏联一夜之间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的教训，因此在与西方军事合作方面比较谨慎。20世纪80年代，中国派代表团考察了英国的鹞式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及相关配套技术，同期也考察了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应该说这两款飞机是当时世界先进战机中的佼佼者。由于对方要价太高，以及后续问题较多，最后没有谈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出于亚太战略考虑，愿意与中国开展军事合作。为了全面遏制苏联，里根总统提出了与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合作的构想。1987年，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和美国格鲁门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5.5亿美元的军购合同，该合同内容是按照美国技术为中国升级歼-8Ⅱ型战机。歼-8Ⅱ是当时中国自主研发的最先进二代战机，但航电及火控系统还比较落后，因此决定与美国合作，准备将这种战机安装美国先进的新型火控雷达、机

载计算机和数据总线等机载设备。改进后的歼-8Ⅱ将具备远距离攻击和较强的拦截能力，从而使其作战性能达到F-16早期型水平。这项合作计划被称为“和平典范”（美方又称其为“和平珍珠”），中国定为“82工程”。

正当“和平典范”项目按计划推进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单方面突然宣布终止合作，给中方造成严重损失。这又一次证明了国防现代化及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邓小平在谈到航空武器装备发展时指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指出，“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

这期间，为了加快发展，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方针，即用新研制的歼-7、歼-8替代老式战机歼-6和第二代原型战机；加速研制歼-7、歼-8的后继改进型战机；以米格-29、苏-27、F-15、F-16等战机为主要作战目标，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中国空军、海军作战需要的新型先进战斗机。

早在1982年，邓小平听取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的汇报后，就明确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国家投资5亿元人民币。随后，这项研制任务交给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不久，该所就拿出了新型战机研制方案。1986年1月，邓小平批准新型战机研制方案，并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联合下发文件，批准歼-10立项研制，代号为国家重点工程“10号工程”。至此，中国正式开始自主研发第三代战机。

与此同时，继续寻求对外军事合作。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苏联双方都

意欲恢复和改善两国关系。然而，中苏两国关系对立已近30年了，由敌对转向友好也并非易事。直到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才使中苏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成功访华后，中苏关系才真正恢复正常化，从而为两国之间军事技术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期间，在集中力量发展空军装备上，上下都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发展上有几种不同意见，其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引进还是自主研制。一种意见认为，为了满足国家安全急需，缩小装备代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拿到可靠顶用的作战装备，因而赞成从国外购买部分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另一种意见认为，买国外的飞机不仅花钱太多，而且还会带来维护保养等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受制于人。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对华“卡脖子”；80年代英阿马岛之战，法国对阿根廷“釜底抽薪”中断导弹供应；80年代末，美国突然单方终止“82工程”合作项目等教训。因而主张坚持独立自主，自行研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必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引进部分国外先进飞机和先进技术，加速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度提升空军的现有战斗力；一方面在引进先进装备的基础上，尽快消化吸收新技术并加速国产化的进程，以避免将来受制于人。最后采用了第三种意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自主研发的艰难

“10号工程”启动后，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为了达到三代战机的各项性能指标，必须采用大量新技术和新成品。按

国际新机研制经验，新型飞机采用新技术新成品一般控制在30%以内，如果超过30%其成功率则在50%以下。“新歼”在设计之初，采用的新技术新成品则超过60%，尤其是飞控、航电、鸭翼气动布局等许多新技术几乎要从概念起步，不仅要冒巨大风险，而且还要突破常规。

经过“七五”计划的艰难起步，“八五”计划的技术攻关，“九五”计划的样机成型，“新歼”的研制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新成品、新系统，不仅对“新歼”的命运是一个考验，而且对整个航空业、电子业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面对“新歼”研制超乎想象的困难，有人主张“歼-10干脆下马别搞了，把钱省出来买苏-27更合算”。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等对处于困难状态的歼-10项目给予坚定的支持。在一次会议上，刘华清坚定地说：“苏-27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歼-10无论如何，就是再困难，也要搞下去！”这一决策改变了歼-10的命运。

这期间，总设计师宋文骢带领歼-10研制团队，紧缩开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关。他们先后攻克了先进气动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以及CAD/CAE/CAM等关键技术。

歼-10飞机由16个大系统、91个子系统组成，涉及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化工等行业和军队的120多家单位。面对一个庞杂的需要实现综合集成的大系统，宋文骢精心协调，指挥若定，使一大批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难题迎刃而解。歼-10飞机还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其性能先进，可以与发达国家主战機種比肩，同时也为后续机型的发展搭建了平台。

1997年5月,“新歼”第一架原型机完成总装,进入到试飞前的系统测试,人们翘首以盼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三代战机早日飞上蓝天。尽管之前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但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又出现严重问题,连续打坏两台发动机。经过反复检查和质量分析,确认是加工过程中未清理干净金属屑,在发动机强大的吸力下,从机体缝隙中吸出后所致。

歼-10首飞临近,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曹刚川找到中航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说:“必须要有领导在现场靠前指挥,歼-10才有可能成功。”于是,朱育理派副总经理刘高倬亲临试飞现场,并对他说:“在首飞之前,你就在成都上班,回北京算出差。”

刘高倬到现场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打坏发动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到首飞,而且也影响歼-10飞机的整体研制进度。于是,他现场组织技术攻关,将机上所有可能让多余物进入进气道的通道全部封死,终于彻底解决了问题。

在首飞前的地面滑行测试中,机轮防滑刹车系统又出现问题。由于是第一次采用数字刹车系统,对技术还未完全吃透,难关久攻不下。春节期间,科研团队一天都没有休息,集智攻关,终于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接下来就是为首飞做最后的准备。1998年3月10日,第一架歼-10首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就绪。为了确保首飞安全,现场指挥部决定11日下午再作一次全面机务检查,并通知北京12日正式首飞。可是,在最后一次检查时,一名机械员发现发动机在试车启动时会漏下不易察觉的三滴油。几次试车,每次都漏下几滴油。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第二天还能首飞

吗?或许这点小故障不至于影响大局,何况北京参加首飞仪式的各级领导都已经准备启程。是按计划首飞,还是排除故障消除隐患,这个决心不好下。经斟酌,现场指挥部认为,研制新机绝不仅仅是为了实现首飞,新机到定型还要飞几千个起落,绝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于是,断然取消了第二天的首飞计划,彻查故障排除隐患。事后,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被总结为“三滴油”精神,贯穿歼-10飞机的整个研制过程。

1998年3月23日,第一架歼-10飞机昂首峭立在起飞线上,蓄势待发。为了这一天,航空工业上百家单位的科研人员和员工已付出了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可是天公不给力,直到下午3点30分,天气才略有转好,首席试飞员雷强穿好抗荷服后准备登机。这时,总设计师宋文骢走了过来,送他登机。宋文骢既激动又不无担心地对雷强说:“就看你的了!”雷强边走边说:“宋总您放心,就是我雷强断胳膊断腿,我都会把飞机给您飞回来!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心血努力,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雷强驾机呼啸直射天空。飞机上升到预定高度,雷强按首飞试飞方案,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和课目试飞。改平,加速,减速,模拟减速下滑,接着超低空通场,旋即又做了坡度和滚转响应测试,一转眼就完成了预定的试飞课目。按原计划在机场上空飞完3圈就该落地,雷强发现油料还有剩余,就请示再飞了一次低空通场。17分钟后,新型战机在空中做了一个漂亮的小航线,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整个机场顿时一片沸腾。

歼-10飞机的研制成功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研发跨代战机的成功实践,实现了中

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发第三代先进歼击机的国家，为中国航空工业增添了持续打造跨代战机的信心。歼-10装备部队后很快形成战斗力，使解放军的现役战机与发达国家的现役战机处于同一代水平，大幅度提升了作战能力，为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提供了重要力量支撑。

合作引进险象环生

在对外军事合作方面，按照中央军委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经过中苏双方积极努力，中苏军事技术合作重新启动。鉴于以往对外军事合作的经验教训，这次与苏联的军事合作项目，不同于以往单单是购买成品，而是致力于在购买成品的同时，同步引进其先进技术和生产线，进而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

起初，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在高层会谈比较顺利，经过多次谈判，双方都表明合作的诚意，并以积极的态度开展新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但在具体飞机型号选型上，还是遇到了波折。苏联方面虽然态度很积极，但推荐的是米格-29战机，其理由是之前中方引进的都是米格系列战机。尽管米格-29总体性能不错，但仍属于轻型战术飞机。无论是作战半径还是载弹量以及火控系统，都难以满足中方的性能指标要求。因此，中方把引进的目标瞄上苏联最新的一款第三代战机苏-27。

令人意想不到的，向中国出售苏-27飞机问题引起苏联军方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是当时苏军最先进的三代战机，苏军本身装备的数量就有限。为此，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力排军方的压力，一方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最后，终于统一

了各方意见，并决定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提供苏-27飞机及有关配套技术。但对苏-27战机的部署有限制，苏方要求中方只能将苏-27部署在长江以南。

这是中苏恢复正常关系后首次军事合作的重点项目。经过谈判，苏联出售给中国的苏-27在配置上与苏联自用型号一致。由于中苏是在1990年6月就引进苏-27整机项目正式开始会谈，所以中国内部将引进苏-27整机项目称为“906工程”，将引进苏-27飞机生产线项目定为国家重点工程“11号工程”。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谈判，终于签署了协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承担了所有条约和债务方面的全部责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承诺会继续履行向中国出售苏-27的义务。虽然时局动荡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中俄双方领导人都着眼于世界新格局和共同的国家利益，不久就建立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因而使得中俄的军事技术合作又步入正常轨道。

随后，引进先进战机生产线在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建设，并全面展开首批苏-27（即国产歼-11原型机）组装生产。由于进口部件与原始图纸有很大差异，在具体生产过程中遇到了超乎想象的困难，在中航工业各级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科技人员刻苦攻关，边研究，边设计，边改进，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一线工人发挥聪明才智，加班加点无私奉献，保证了整个生产流程都按节点完成。

1998年末的一天，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划向湛蓝的晴空，第一架国产重型三代战机歼-11昂首呼啸直射蓝天……

驾驶战机的是首席试飞员付国祥部队长。他在空中按计划完成了所有试飞课目。随着新型战机平稳落地，中国引进的

首款三代重型战机首飞成功。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国防力量已实现质的飞跃。中国航空工业一跃跨进世界研发三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向世界一流迈进

毫无疑问，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坚定地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自主研制成功歼-10飞机，随后又不断创新研制升级，形成歼-10系列型号；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外军事合作，开创了军用飞机领域合作的全新局面，相继从俄罗斯引进了苏-27、苏-30等先进战机，随后在消化吸收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先后研制成功歼-11系列多用途战机，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整体实力，加速实现了空军战斗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国军事航空工业也走上了一条自主研发与对外技术合作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自主研制的歼-10飞机和合作引进的苏-27战机的成功，不仅仅为中国空军提供了与发达国家空军比肩的先进装备，更重要的是为后续改进型飞机的研制和第四代战机的研制构建了新的平台，并形成了面向新一代武器装备的基础技术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引进苏-27和苏-30等飞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苏联的军事合作不同，不再像那时只照葫芦画瓢一味地仿制，而是在借鉴消化技术的基础上再度创新，旨在借力弯道超车实现飞机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在后续的量产及改进过程中，大量吸收和融合世界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其中包括中国自主研发的诸多新材料、新技术、机载设备及火

控系统，从而衍生出具有不同作战性能的歼-11系列、歼-15系列、歼-16系列等多型歼击机。

这项跨世纪的引进项目，不仅满足了中国空军、海军装备升级换代和提升战斗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加速自行研制歼-10系列战机赢得了时间。通过歼-10和歼-11这两款三代战机的研制和生产，中国建立起更加系统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造就了一批顶级飞机设计师、工程师、试飞专家、科研队伍，撑起了新时期中国航空工业的脊梁，为航空装备成体系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为发展第四代战斗机和大飞机及民用飞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一流的军队需要一流武器装备作为重要支撑。令人欣喜的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已结出了丰硕成果。如今，中国航空武器装备呈现“井喷式”发展：以歼-10、歼-11飞机大批量装备部队和系列发展为代表，推动军机装备弯道超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二代战机向三代战机的跨越；以歼-15飞机在航母上完美起降及完成系列任务为起点，标志着中国军力正在加速迈进以空强海的深蓝时代；以歼-20为代表的新一代战机列装，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同代比肩，标志着中国空军又完成向第四代战机的新跨越；以运-20飞机为代表的系列运输机的研制成功，使中国一跃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之后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标志着国家战略进一步延伸；以空警-200、空警-2000预警机等特种飞机为代表，实现了中国航空特种装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航空装备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摘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12期，原文约7500字）

【史海烟云】

从“万里长江第一桥”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完颜文豪

2018年10月24日，全长55公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个横跨伶仃洋海域，将香港、澳门和珠海连为一体的“超级工程”，从开工那一刻起，就连续创造“世界之最”，其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高，工程规模之大，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绝无仅有。

令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集结了中铁大桥局、武船重工、中铁宝桥等各路桥梁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中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CB05标段的“战队”，正是在61年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国家队。

61年前的10月15日，在5万武汉市民的见证下，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到如今我国依靠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装备建成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跨越大江大海的两座大桥，见证着我国桥梁建设从技术落后、依靠外国援助到技术领先、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历史巨变。

“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

2018年8月9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南岸边，一节重近500吨的钢箱梁被从江面平稳吊起，与已架设梁段精准匹配后临

时连接，标志着武汉长江上的第十一座大桥的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仅宜宾以下的长江干流上，包括在建的长江大桥总量就达138座。

不过，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前，在长江上修桥，曾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到了中国近代，不少仁人志士为大桥建设设想、勘测，却只停留在一纸蓝图上。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的长江大桥梦，终于从蓝图走进了现实。

1955年9月，23岁的刘长元，刚从长沙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领取了毕业证书，就背上行囊，来到武汉长江边的一座茶楼。不远处的江面，一项全国性的重大工程正在施工建设中。

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指示铁道部，筹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经过一系列研究、设计、鉴定，3年后，武汉大桥工程局（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成立，决定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建设长江上第一座大桥。

这座设计为八墩九孔、三孔一联的桥梁，从4号桥墩以北的工程，由汉阳岸边的第一桥梁处建设（以下简称一桥处），从5号桥墩以南，归武昌岸边的第二桥梁处（以下简称二桥处）负责。

武昌一侧较为繁华，岸边众多茶楼旅馆，为了建桥，改成了技术人员宿舍。到二桥处报到的第一天，刘长元领了两条凳

子、一大块铺板、两个灯泡、一把锁两把钥匙，用凳子支起铺板当作床，装上灯泡，就在茶楼安了家，“比现在农民工生活条件差远了”。

风华正茂的年纪，一大批土木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刚走出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等院校的校门，就跟刘长元一样，奔赴长江两岸，住进了茶楼旅馆。此前，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等25位苏联专家带着家眷，已经住进了汉阳凤凰山上的小楼房。从多个单位抽调来的33名工程师，来自湖南株洲的机电工、山东的铆钉工、东北的装吊工等技术人员，1408名复员转业军人，来自各地的铁道兵，陆陆续续赶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建桥队伍。

这项举全国之力的庞大工程，终于开工建设。

2018年初，在汉阳区一栋高层住宅楼里，86岁的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刘长元，回忆起没有大桥的年代里，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线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被长江天险阻隔，南下的人们坐火车到了汉口江岸，就下车换乘轮渡，到江对面的武昌徐家棚车站等着。行李留在火车上，随空车皮和车头分批装上渡船，上岸后，人们再走进车厢。

这种奇特的场景，被当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每遇恶劣天气，江面轮渡就停航，一涨水，长江封航，武汉三镇就断开了。

送别“百岁老人”，迎接“新生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连一个像样的桥梁建设机构都没有。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要建设长江大桥，其难度和挑战前

所未有。

1953年5月，我国尚缺乏建设特大桥的经验，所以请苏联帮忙鉴定把关，此后28位苏联专家先后来到武汉，参与到大桥的建设中。

为了培养建设人才和积累建设大桥经验，同年11月，长江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水铁路桥动工兴建，次年汉水公路桥也正式施工，两项工程分别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完成。

然而，1954年，工程局在对长江河槽进行大规模勘探后发现，水文地质情况异常复杂，世界上流行的桥墩基础施工方法，在长江大桥建设中无法采用。

那正是我国专家提出、苏联专家鉴定委员会通过的方法——在世界桥梁史上运用了近百年的气压沉箱法。

一生专注于桥梁建设事业的刘长元，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在太空舱内穿梭的情景，总觉得“蛮熟悉的”，他总会想到当年的气压沉箱法。

“这种方法，要先将一个沉箱沉入江底，工人在箱内一个舱，另一个舱依照下沉深度注气加压，气压与刃脚处地下水压力平衡后舱门打开，工人下到江底在无水环境下直接施工。”

这种方法，在长江却面临着诸多难题，采用这种施工方法水深极限是35米，长江汛期长，每年有八九个月水深大大超过这个极限；下沉到30米时，对工人健康威胁很大，当时缺乏专门的医疗设备保证施工；需要工人潜入数十米深的江底，开凿6400多立方米的岩石，其困难和艰巨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没有先例；有一个桥墩的地质层，含有硫化物，沉箱工作室室内会产生亚硫酸毒气。

刘长元至今仍觉得，西林对武汉大桥的建成有着创造性的贡献。老方法不能

用，在所有人对桥墩施工一筹莫展之际，这位苏联专家，想起了年轻时的煤矿工作经历，大胆地提出了把煤矿上钻孔的技术，应用到桥墩基础建设中。

西林首创的管柱钻孔法，要把一批预制好的、直径1.55米的钢筋混凝土管柱，依靠机械的威力打入江底，再在管柱内向岩层钻孔、灌注混凝土，让它们在江底岩石里牢牢地生根，然后浇灌混凝土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桥墩就从这个基础上筑出水面。

“气压沉箱是‘百岁老人’，关于它有上百种书；管柱结构、管柱钻孔法是‘新生的婴儿’，还没有一本书。”西林的这番话，被桥梁史专家余启新写进了有关长江大桥的书中。

从1955年初开始，中苏两国技术人员，经过长达6个月的试验，最终验证了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首创的管柱钻孔法，在中国后来的桥梁建设中被广泛运用，让流行了一百年的老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

60多年后的今天，大桥桥墩建造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制造技术，曾经的“新生儿”也变成了“老人”，已经退出了建桥的历史舞台。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这种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我国后来自主设计、建造大桥埋下了一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变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桥梁建设者，不断突破新的技术难题，创造一个个桥梁史上的“世界之最”。

蚂蚁啃骨头，自制新机械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风急浪大

的海面上，一台台先进庞大的机械设备屹立着，推动大桥工程向远处延伸。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起重船“振华30”，具备单臂固定起吊12000吨、单臂全回转起吊7000吨的能力。我国自主研发的“天一号”3000吨运架一体船、“小天鹅”号2500吨运架一体船、“大桥海天”系列混凝土工作船等先进施工设备，成为“海上建桥利器”。大桥建设者从零开始研究攻关，完成了我国第一座外海沉管隧道的施工安装。这些我国自主研发的桥梁建设技术和机械设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当时间倒回至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新中国只得在苏联的专家与技术援助下，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那个年代，我国连一块制造机械的大型钢锭都无法生产，一台17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也只能向苏联购买。

1955年，新方法试验成功后，1号桥墩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建桥工人，用一大块铁皮、钢板，在水中围成一个船体，四边抛锚固定，中间留出桥墩的空间，就建成了一个钢围囿。

刘长元描述，为了赶在枯水期建好桥墩，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8小时一个班，每天三班倒不停工，晚上的江面灯火辉煌，蓝色工作装在钢围囿上晃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很快，第一个难关出现了。如何把一个三人合抱的钢筋混凝土大型管柱，穿过相当于四五层楼高的泥沙，平稳地落在江底岩盘上，伤透了建桥队伍的脑筋。

为了使管柱下沉，他们在管柱外用水冲泥沙，在管柱内吸走泥沙，再加上一个26吨重的混凝土锤来打，看似可行，管柱却始终“倔强”地不愿下沉。

2018年1月24日上午，武汉下起了小雨，冰凉的雨滴夹杂着雪晶，敲打着长

江边上的一栋老楼。四层的一间老屋里，一台小电暖扇不停地摇摆着脑袋，96岁的钱学新，颤颤巍巍地找出一本厚厚的相册。

比扑克牌略小的黑白老照片，紧凑地挤在一张张硬纸板上。老人一手托着相册，一手指着照片里的齿轮、钢铁吊臂、打桩机，向记者讲述60多年前，那一代建设者如何用这些钢铁机械，在水深浪大的长江上建起8个巨大的桥墩，架起一条钢铁桥梁。

1946年，钱学新从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后，到广州铁路局工作，7年后随着大桥局的成立，被调来参与大桥建设。

由于缺乏建设大桥的机械设备，大桥局只能自行设计、研究、制造。钱学新与同事们，在汉阳一处报废造船厂里，建起了一个小的机械制造车间。

锤打管柱的方法走了死胡同，中国就从苏联引进一个17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后来又买来一个30吨震动力的，但是桥墩的建造需要的震动力高达90吨。

这么大的机械，中国没有，苏联也没有。钱学新和同事们，就依照苏联提供的图纸，根据小型的打桩机模拟放大，着手研制一台90吨震动力的打桩机。

一切从头开始，当时整个国家还没有大型的钢锭，他们就从战后废弃的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里捡废料，“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将大块钢材切割成机械设备需要的形状。”在制造车间，靠找来的能工巧匠，用日本战后赔偿的几台普通的车床、刨床，把小块钢材加工成齿轮、钢板、偏心块等机械零件。

第一台90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终于制造成功了。当时的报纸描述，这部威力强大的打桩机，放在管柱顶端开动起来时，一个巨大的管柱如同铁钉扎豆腐一

样，迅速地下沉到岩盘。

到了1955年底，用新方法、大威力打桩机建成的1、2号桥墩，已耸立在江心水面上。

后来，钱学新又参与制造出两台单台震动力达到155吨的打桩机，两台合并起来作业，大型钻机、射水机、抓泥机、吸泥机等机械设备，也从简易的车间里被制造出来，建桥墩的难题迎刃而解，一个又一个桥墩钻出江面。

今天，中国大桥建设的技术水平和大型设备，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苏联援建下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主创新技术和建造的大型设备，已跟随桥梁建设者的脚步，迈过峻岭险滩，穿越百川千湖，跨过海峡深沟。在世界排名前十的跨海大桥、斜拉桥、悬索桥中，中国都已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数量。世界桥梁界渐渐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世界桥梁建设20世纪70年代以前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纪看中国。

一座桥与一座城的故事

相比武昌那边的热闹繁华，江对面的汉阳，赵煜澄所在的一桥处要荒凉得多。曾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小组组长的赵煜澄，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汉阳，“老百姓少得很，很多地方都是坟墓。”

那个年代的工人们，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热火朝天地为大桥建设奉献着力量。“冬天江里风大，又冷，工人们穿着棉袄，就用个带子腰间一系，能够挡点风。”今年89岁的赵煜澄老人回忆道。

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住着工棚，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混杂着各地的方言，因为属于铁道系统，就慢慢形成了大

桥工人中特有的“铁话”。后来一部分人留在了武汉，工棚变成了汉阳江边的居民楼，从此出现一个叫“建桥新村”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居民说着不是湖北方言、又不标准普通话的“铁话”。

1955年的国庆节，放了三天假，赵煜澄加了两天班，剩下一天，办了场婚礼。那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婚礼，“晚上找来几个朋友，在汉阳借了同事一间宿舍，一起吃点花生米、糖果，就完了，没什么仪式。”

大桥建设时，机械化水平还不太高，不少工期需要大量的人力，武汉市每个区每个街道的老百姓，就自带干粮，轮流跑到工地上，用原始的人挑肩扛的方式，参加抬沙子、卸水泥的义务劳动。

不只是武汉，为支援大桥建设，全国24个大城市，包括48个大型工厂企业都曾为其出过力。

江城武汉，曾经举全城之力建设一座桥，在此后几十年间不断续写着城市与桥的故事。如今的武汉市，形成了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工程施工、装备研发、材料研制、监理与咨询等桥梁建设的完整产业链。

这座城市的建桥企业，设计勘测、施工、监理了近百座长江大桥，长江干流138座大桥，八成为武汉企业建造。2017年的中国国际桥梁博览会在武汉举办，中国（武汉）国际桥梁科技论坛，已变成桥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之一。作为新中国桥梁建设的发源地，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建桥之都”。

大桥的建设紧张又紧凑，一个桥墩还没建成，另一个桥墩已经开工，8个桥墩刚建好，大桥钢梁就已经准备就绪。

1956年7月7日，“哒哒哒”的铆钉枪的声音，第一次响在长江的上空，大桥

钢梁开始安装架设。当时的焊接技术还很落后，专家提出用铆钉衔接钢梁，这种方法对技术有着堪称严苛的要求：铆钉之间的距离不能有1毫米的差错，铆钉与钉孔的空隙要在零点几毫米之内。

赵煜澄回忆，钉孔直径是26毫米，铆钉应该是25.7毫米，铆钉要在焦炭炉里烧到800度，工人用钳子夹起来甩过去，铆钉枪从两侧哒哒哒地固定铆钉。

铆钉装了1万多颗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铆钉和钉孔之间有空档，最大的有2毫米，“万一松了，这个桥就躺掉了。”

大桥局紧急决定，一万多颗铆钉，全部捅掉作废。停工一个月的时间，中苏两国专家，反复讨论、试验，最后把原来的半圆头普通铆钉，改成高头锥体铆钉，再安装发现铆孔基本都能填满，有的只差0.4毫米，达到了工程标准。

长江上空又响起了密集的“哒哒哒”的声音。一条“钢铁长虹”渐渐在江面上展露雄姿。

一座桥的建成，为我国培养了一代桥梁建设人才。从大桥局成立开始，不到五年时间，各项工程培养出90名工程师、153名技术员、9名技师以及1634名技术工人。1408名转业军人，已经成为各种技术工人、技术领导人和管理干部，3年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几乎全部成长为工程师，每个都能在桥梁建设中独当一面。

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竣工，数以千计的桥梁建设者，陆续奔赴全国许多大小江河，参与修建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重庆嘉陵江公路桥、南京长江大桥……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桥梁建设者在江河、山谷之间架起一座座大跨度桥梁，中国人建桥的智慧和力量也在走向海洋。2005年，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东海大

桥建成通车，此后相继建成杭州湾大桥、青岛胶州湾大桥、泉州跨海大桥等多个跨海大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毛泽东主席曾数次视察长江大桥的建设，1956年5月底，63岁的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6月1日、3日和4日三次横渡长江，在第二次横渡长江时穿过施工中的大桥。

此后，他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诗中的“一桥”，正是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大桥的美术设计方案，在建设初期，便向全国征集。已故著名桥梁设计专家、桥梁美学家和桥梁史专家唐寰澄，当时在大桥局总体设计组工作。1954年，28岁的他，也提交了一份桥头堡的设计方案。

据唐寰澄长子唐浩介绍，父亲年轻时会弹琵琶，喜欢中国画、水彩画，对古典建筑、古代桥梁很痴迷，1953年在故宫看到首次公开展出的清明上河图，就被“汴河虹桥”深深吸引住了。

在设计中，唐寰澄借鉴清代黄鹤楼的“攒尖顶亭式”的建筑风格，运用大镂空长窗以及莲花宝座，联想到西方教堂的圆形穹顶，将东西方元素、中国古典传统融合到现代桥梁设计中。

在入选的25个桥头堡设计方案中，他的设计排名第25位，在一大批城堡、高塔中，被评为三等奖。所有方案在中南

海怀仁堂展出，周恩来总理选中的方案，正是唐寰澄的第25号。“当时国家讲究节省造价，我的方案造价是最低的，也很美观。”他后来回忆说。

1957年5月4日，大桥钢梁顺利合龙。同年10月15日，5万名武汉市民涌上长江大桥，见证大桥落成通车典礼，“万里长江第一桥”就此诞生。

通车那天，赵煜澄和几位建桥先进工人干部，坐在头三辆敞篷车里。火车司机殷海林，驾驶着有史以来第一列从北京开往南方边境的直达旅客快车，通过长江。79岁的何香凝坐着轮椅，参观了大桥。

那两年，在建桥新村，有25个叫“建桥”的新生婴儿，还有15个“汉桥”，9个“建成”，以“桥”起名，成了年轻父母赶时髦的事情。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这支“中国建桥国家队”，如今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2600余座大桥，总里程2000余公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队伍，早已走出国门，跨越山川，在亚非大陆的大江大河上建起一座座大桥。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曾说，“拿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几乎没有中国人不能造的桥”。回首我国半个多世纪的桥梁建设史，从在苏联援建下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到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再到如今自主建造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中国的建桥史，折射出中华民族从依靠外国援助走向独立自主的奋斗历程，书写了中国工程建设从“零”的突破到走向世界之巅的宏伟篇章。（摘自《档案记忆》2018年第12期，原文约7000字）

【人物春秋】

周恩来倾心指导中国“上天”事业

房士鸿

周恩来曾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至今仍是指导国防尖端工作的原则。

远见卓识，深谋远虑

周恩来曾在苏联建成世界首座原子能电站时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

1949年3月，钱三强提出赶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钱三强的想法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成。3月22日，周恩来致电李维汉：钱三强所谈购买实验设备事，望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买后如何运回。几天后，周恩来又和李维汉面商所需外汇及支付办法。此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在科学

技术上做了一定的基础准备。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谈判。1957年，他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支持聂荣臻、陈赓等率团赴苏谈判，顺利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周恩来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使我国科学工作者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时间，赢得了速度。

沉着应变，果断决策

正当中国研制两弹及其尖端科技刚刚起步的时候，1959年6月20日，苏联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的协定。1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供所有设备材料，给中国留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给我国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在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周恩来对这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1960年7月11日，他在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报告上做了多处旁批，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

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

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三年到五年过关。由于相继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十分得力，又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到1962年下半年，我国核工业建设不但没有因此而停顿，而且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建立健全了我国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

敏锐洞察，抓住关键

在周恩来看来，研制两弹，掌握尖端技术，人才是关键因素。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号召：“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他强调：“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物理专家的组织才能都很强，钱三强是科学院的秘书长，又是青联的副主席，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周培源是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在浙江大学有个物理专家，叫胡济民，担任副教务长，调了好久调不来，这次要下命令调来，从行政部门

把他们‘解放’出来。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做教务长，当个名誉教务长也可以嘛。总之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1962年10月，罗瑞卿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11月17日，中央成立了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在专委会成立后仅半个多月，周恩来就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专委会会议。许多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或提名调到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的。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战斗中。

聂荣臻曾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两弹一星”的运筹、组织、管理者，周恩来以超人的胆识和非凡的领导智慧为中国的“上天”事业殚精竭虑，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使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摘自《新湘评论》2018年第24期，原文约2000字）

刘少奇调研求真话

姚 远

特邀“泥巴腿”代表进京交谈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拉开了我国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的序幕。

为了了解人民群众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看法，刘少奇打算托人捎信给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今宁乡市花明楼镇），请乡亲们选派几位老农到北京来，当面与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刘少奇在大学毕业的侄孙刘正山受刘少奇的委托，从北京回到家乡过暑假，带来了刘少奇的口信：希望家乡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选派几位老实、有经验、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谈谈心；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

刘正山回乡后，找到了农会主席王升平等，请他们拿主意。经过反复认真的协商、比较、筛选，花明楼乡干部最后决定选派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4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9月初，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代表到北京相聚面谈。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接待人员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车子载着4位身份特殊的农民七拐八弯地来到了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这时，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几只书柜、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拉完家常，刘少奇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眼，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乡下实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

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做到？”

4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代表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够做到！”

通过与农民通讯员的书信往来 及时了解乡下实情

当时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的王升平和乡长邓子卿，也想进京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乡干部脱不开身，还因为他们年轻，不够老农资格，没有被选上。于是，王升平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托成敬常亲手交给刘少奇。令王升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的10月23日，就收到刘少奇的复信：“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的来信，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是好的，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王升平、邓子卿和乡亲们读着刘少奇的来信，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激动。

1954年，刘少奇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

后到处宣扬说刘少奇如何如何热情地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了奖励，给了他们一笔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王升平听到后，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有什么功可报的呢？于是，王升平便给刘少奇写了第二封信，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之外，还着重说到了那两人进京造成的不良影响。未过多久，王升平就又收到了刘少奇的第二封亲笔回信：“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真实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我不知道，通过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回乡调研期间当面跟农民通讯员 深入体察民情

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轻装简从，专程来到湖南省宁乡、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5月3日，刘少奇回到他阔别40年的故乡炭子冲，继续他的调查走访。回到故乡，刘少奇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农民通讯员。

5月4日，刘少奇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

5月6日上午，刘少奇找来他的农民通讯员之一、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从早上到中午，刘少奇与王升平谈了3个多小时。时值午饭时分，刘少奇夫妇热心地挽留王升平同他们一起吃了顿便饭，边吃边谈。刘少奇明白王升平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当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

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饭后，当王升平告辞时，刘少奇紧紧握着王升平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总共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20多场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为当时党解决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同时也把党的政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把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展示在了群众的面前。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重大突破是，根据刘少奇等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广大农村干部、社员的愿望，取消了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严格评工计分；并针对大家关注的食堂问题提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还对保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新条例颁布后，农村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农民生活逐步安定，生产普遍有了发展，粮食产量逐步回升。（摘自《党史纵横》2018年第12期，原文约6000字）

【海外反应】

海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研 究述评

周文华 董莹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各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深层次思考,既有对成效的关注,又有对问题的分析。关注海外的相关研究,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营造更加和谐美丽的国内生态环境,也有助于发挥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又有助于中国的相关国际议题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海外积极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及成效,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充满信心,部分学者提出中国可以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率。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九大报告提出 to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社会各界也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中。

部分海外人士分析了中国国家领导人自然观的发展变化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美国学者魏乐博和包弼德说,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与环境的和谐,这种思想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并没有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无害于环境的行为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人类自己的效用。美国学者马立博进一步提出,如果说毛泽东主张无限可塑性的自然观,那么邓小平则把自然看作为人类需要而准备的一个庞大的储备库,两者都认为人类可以也应该通过科学来掌控自然;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200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马立博积极评价了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视,但忽视了毛泽东时代有关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邓小平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治理举措。

海外尤为关注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强调,中国领导人已经完全明白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200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规划》预示中国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一个重大转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要想处理能源与环境难题,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整,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包括“绿色GDP计划”、暂停为污染企业贷款的“绿色信贷”政策、暂时取消污染公司出口资格的“绿色贸易”政策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海外对此给予高度关

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发展给环境带来一定破坏，而中国领导人看起来是非常坚定地要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已经接受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论据，无论是领导人的公开言论还是日益增加的新环境法规，都体现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的高度重视，很明显中国已经决定走一条能源密集度较小的增长路径。在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控制等方面，中国已出台一系列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中国还付出巨大努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和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国，也在下大力气发展电力汽车。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使美国生态文明研究专家罗伊·莫里森深受鼓舞并成立“中国国际工作组”来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青山周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认为这显示了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度在提升。

海外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机构负责人也高度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与力度。澳大利亚气候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约翰·康纳、东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高级职员奈吉尔·翰特尔、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尼吉·德瓦等人均强调了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的重要意义。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比较中表现突出

海外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突出表现，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比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有更为可取之处。迈尔斯·麦肯纳以排污权交易系统、国家级清洁能源目标、针对高耗能企业的能效管理条例等为例，强调中国比美国更积极地采取行动以应对环境变化。有

学者就北京和新德里的雾霾治理进行了比较，强调北京严格的交通限行、污染企业外迁、减少煤电使用、建立重污染预警系统等措施的良好效果；而新德里空气污染更严重，但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而且，中国的权力体系有利于在环境问题上采取多地区的联动治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认为，与印度、韩国和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在过去20年里减少了每美元GDP的能源和碳消耗。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尼科莱塔·马里戈等人比较了中英两国太阳能光伏研发的创新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创新体系主要以商业为导向，有利于技术创新；而英国尽管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现全球领导力，但进展缓慢。中国公司通过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并争取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等方面的支持，既关注国内又在欧美有较大市场，属于出口导向型行业；英国的研究机构高度分散，难以达到足够规模，不利于技术创新和向商业转化，很多人认为太阳能光伏只在热带国家才有效。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皮埃尔·皮卡尔认为，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已经成为全世界发展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增加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加大研究力度，中国的绿色理念对全球生态安全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开启生态现代化进程

针对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以及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创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海外认为中国逐步开启了生态现代化进程。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阿瑟·莫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使现代社会的社会实践和制度改革围绕着生态来进行，鉴

于中国大多数环保改革都牢牢地建立在现代化过程的基础上并利用和依赖于这个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生态现代化”来描述中国沿着生态之路重建经济的努力是合理的。同时，中国的生态现代化模式不同于得到广泛研究的欧洲模式，其发展过程还远没有结束。

罗伊·莫里森在《2140：一部22世纪的历史和幸存者日记》中预言，中国将于2070年到2090年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他于2013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充分肯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美国阿肯色里昂学院的保罗·布伯认为，中国不仅充分认识到了过去几十年快速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问题，也在自觉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需要一个过程。他举例说，美国从通过《清洁空气法案》到洛杉矶等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有相当长的“延滞时期”。他认为中国在这点上比美国强，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引领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就“中国能够走向绿色吗”这一话题，《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针对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红色中国即将成为绿色中国。他强调了中国开发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发动机等绿色技术，以及一些地方官员对低污染发展的愿望。《华尔街日报》记者夏雷强调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工业国家，正雄心勃勃地推广清洁技术，可能会重塑燃煤发电业务。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两集专题片《中国能否走向绿色》提到，中国在发电行业和汽车行业中出现了一些特殊而且领先的绿色解决方案。马立博认为，这些媒体除了介绍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外，也意在劝诱西方政府支持绿色技术以免落后于中国或失去绿色技术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认为，中国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比以往高速发展的工业模式更加完整和均衡，有利于中国的持续进步和公民生活质量提高，有利于保护全球生态安全，中国将开启生态文明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前景光明

海外高度评价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前景光明，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表率。

罗伊·莫里森指出，中国正从普通工业文明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特点的生态文明，将引领整个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她认为，中国作为高增长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一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长期致力于环境问题研究，他于2016年4月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强调中国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强决心，并设置了非常合理的碳排放指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奥巴马亚洲事务首席顾问杰弗里·贝德认为，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中国项目主任芭芭拉·菲纳莫雷最近10多年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她认为，中国在推进绿色发展、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方面可以做其他国家的表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认为，对环境日益加剧的担忧促使中国努力探索水力、风力、太阳能等新能源以替代煤炭和石油，中国将成为发电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现居挪威的乔根·兰德斯预测，2052年中国将成为系统性抗击气候变化的国家中最有效、最有组织的国家；中国还将证明自己有能力避免大规模的不稳定现象，并以建设性的有效方法运用资源。他认为，2052年的

中国将拥有强大的气候适应能力，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还会积极地向“伙伴国家”以及缺乏有效管理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双边气候适应援助。巴黎气候大会前，英国气候变化领域的两个著名的非营利机构“中外对话”机构和“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发布联合报告，认为中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是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外对话”机构刊物的主编、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研究员萨姆·杰尔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投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向世界提供相关技术。

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主要特点

综观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可以看出，从国别来看，以美国的研究为主，英、法、德、日、澳以及荷兰、挪威等国均出现若干研究成果，这与美国中国学在海外中国学中的优势地位相一致；从时间来看，2000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与这一时期中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节奏大体一致。从研究人员来看，以高校学者为主，还有大量来自智库、政府和媒体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等，且中外学者合作研究越来越常见；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量海外研究基于对中国某一具体地区某一具体问题的实地调查而展开，例如，针对黄土高原、贺兰山、澜沧江、湄公河、长白山、西双版纳、西藏、黑龙江、淮河、苗族地区、西南农村地区

等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总体来讲，海外从多个视角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研究法、实地调研法、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

历史研究法。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和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环境的变迁。虽然《大象的退却》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环境问题，但成书于2004年，为海外进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的时间跨度则从新石器时代至今接近一万年的时间，几乎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其中近1/5的篇幅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

实地调研法与文献分析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研究建立在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所著《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考察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论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彭博社记者亚当·明特经过在中国十余年的实地调研于2013年底出版《废物星球》一书，他认为中国在废品回收再利用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他说，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需要大量原材料，每年从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进口大量废品进行循环利用，并已成为全球垃圾的天堂。全球化的废品回收业促进了中国发展，但诸如电子类废品的低科技循环对中国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中国政府需要对这个产业提供强力政策支持，包括为技术升级提供财政支持，与相关高级专家和企业家建立联系等。奇普·雅各布斯和威廉·凯

利 2014 年出版关于中国雾霾的调查之作《化学品共和国》，写作期间他们查阅了上万页文献档案，开展咨询和访谈，了解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中美著名环境专家的观点，并在北京、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等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考察。

比较研究法。海外经常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美国、英国、印度、巴西等国进行对比，在分析异同的基础上提出建议。迈尔斯·麦肯纳比较了中美排污权交易系统以及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目标差异等问题。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商学院李兴华比较了中美传统文化对人们环境观念的影响。她认为，美国文化里往往有天启的内容和对世界末日的描述；而中国人不愿意相信大灾难的降临，更珍视当下相对安定的日子。此外，还有海外研究比较了中英在太阳能光伏方面的创新机制以及中印治理雾霾的差异等。

侧重社会治理视角

海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往往从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入手，特别强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所带来的治理方式的变化。

关于计划与市场。青山周说，日本各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尚存计划经济制度框架，可以使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对企业和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在政策中增加环境治理的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已无法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发挥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作用，而且中国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使政策在地方间缺乏协调性，很难推进环境和经济的统一。青山周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需要政府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相结合，使环境政策被经济政策所内部化，进行政府、企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改革。与此类似，菲利

普·安德鲁斯—斯皮德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节能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以计划经济为主，工业生产主要在国有部门，政府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推行该计划，那时的政府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非常适于推行指令性的节能措施。90 年代以来节能效果不佳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巨大变革，削弱了指令性节能措施的效力，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与消费都不再受计划的约束；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降低；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与企业中的权威也已下降，即使 1997 年的《节约能源法》也几乎没带来有意义的行动。马立博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森林和草原的破坏情况。他认为，随着农业集体化的瓦解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出现，部分农民砍伐森林建造房屋；部分国有林业公司过度砍伐应对市场需求以提高经济效益；部分地方官员也鼓励砍伐森林以便获得最大可能的税收收入。

关于城市化。阿瑟·莫尔考察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问题，他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大量“被浪费的城市”，新建的大片地区无人居住，花费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对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为了防止这类城市进一步增加，并将现有的城市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中国必须大力改变其城市化和住房政策，同时通过制定中长期和短期规划加强环境治理。这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对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如果能恰当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则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提供宝贵的经验。

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球视野

鉴于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耗量以及对世界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海外研究既关心

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强调中美等主要国家合作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重要意义。

首先，国际合作意义重大。中美合作在国际合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安东尼·吉登斯说，中美合作确实必要，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上，它们把握了世界的未来走向。事实上，两国已经在努力创建能源对话机制，还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污染国必须在未来几十年里一起做出大量的痛苦抉择。两国在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可以就碳收集及封存技术进行有效开发，在工业节能、生物燃料、绿色建筑、核能等领域协作。两国都需要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框架，而中国以何种姿态去解决所面对的能源挑战，将直接预示一个多边气候框架能否出现。中国的经济调整不应该是将重工业和碳排放移向其他国家，而应该通过生产上的转变减少全球范围内的工业碳排放。斯蒂芬·米纳斯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存在根本争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环境污染中的分工问题逐渐成为谈判中的红线。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和环境保护条例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中国正追寻一条绿色转型的道路。法国雷恩第二大学让—保罗·马雷夏尔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目前出现了两个因素有利于推动谈判向好的方面发展：一是空气污染问题触及中国本土，迫使当局必须采取行动改善环境；二是中美在绿色技术方面产生竞争，中国采取多种方法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优先的工业目标，在推广风

能、太阳能、节能灯、电动汽车等绿色技术以及科研投入方面已经远超美国。因此，构建新的合作体制的前景并非如许多分析家认为的那样悲观，两国就算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努力寻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2014年11月中美发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此，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德里·马库分析了中美双方的承诺和中美气候合作的重要意义，指出虽然两国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距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所要求的减排力度还有很大差距。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要在巴黎达成的新国际气候协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给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也给国际社会带来希望。

中欧合作也是海外关注的重要内容。比利时欧洲学院门镜教授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强调国际制度和规则，但国家间合作似乎更加重要，任何国际协议都必须由国家实施，随着中欧气候合作的深入，中国也朝向一个更加制度主义的趋势转变，这对强化中欧气候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荷兰鲁汶大学大卫·贝里斯等人详细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多层面的气候双边外交及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影响。他们分析了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政治中权力关系的重新界定，而中国的崛起是理解这种权力关系重构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下，面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能源和气候是中美欧三边之间合作最成功的领域之一，而在贸易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困难更加明显。这表明三方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都找到了共同目标，这种合作也许能够为全球气候政策提供积极的包容性的推动力。作者强调，气候变化已经从边缘进入了国际关系的中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成

功合作具有潜在的扩散性，因为在低碳发展、贸易、就业、健康、能源安全 and 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许多协同的方面。气候变化需要更加合作性的新型外交，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进步可以导致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国际体系，反过来，更程度的合作也能够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大进步。

阿瑟·莫尔分析了中国在非洲的环保行为，认为中国对非洲的环境影响似乎与世界体系理论对新兴大国的预测一致，即新兴大国与外围经济体之间存在“环境不平等交换”，但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行为均受到环境规范的制约和引导。当然，中国要成为世界的绿色榜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国际社会需要理解中国。尽管海外有人针对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进行指责，但也有不少声音呼吁国际社会要增强对中国的理解，并与中国一道面对全球环境问题。丹麦著名环境学者、哥本哈根共识的创建人波恩·伦伯格认为，许多西方政治家指责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妨碍了一项全球低碳条约的签订，这些人不懂得中国对此的抵制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峰会的失败有更深刻的原因，即发达国家无视各个国家的利害关系，一味坚持要发展中国家参加实质性碳排放减少约定，结果一事无成。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急剧减排的成本太高，而发达国家必须减少排放。英国迈克尔·T·克拉里提出，中国领导人怎样权衡相互竞争的目标和相互冲突的利益是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中国在能源方面的行为引起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和环境方面的担忧。针对中国收购西方国家石油公司遇到的阻碍，他认为，西方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前景良好的能源交易之外的做法只会使各方关系恶

化，国际社会应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国在战略性能源方面所处的两难境地，并积极与北京合作开发环保型替代能源。曾在德国外交部任职的海恩里希·克雷夫特认为，把由于能源而引起的争端看作纯粹是中国的现象是错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是培育区域能源组织，为真正有意义的能源对话提供一个平台；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内，应对彼此在能源方面的不安全感表示理解，发展新多方共赢的合作方式。

总体上看，海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研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给予高度评价，以罗伊·莫里森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一类极力渲染与夸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尤其以生态威胁论最为典型，这类观点因不够客观而遭到国际社会多方批评；还有一类研究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辩证审视其成效与问题、现状与进展。如伊丽莎白·伊科诺米通过对淮河流域环境变化的考察于2004年写成《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一书，论述了中国为发展经济而付出的环境代价以及中国的环境压力，也介绍了中国的环保努力和突出成就。2015年，她与迈克尔·列维合作出版《中国的资源需求怎样改变世界》，他们认为，中国尽管有巨大的能源需求，但并不是吞噬世界上所有资源的“大胃王”，中国的资源能源需求并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可见，海外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不同的评价，既与研究者的不同价值取向有关，又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与问题并存有关。（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原文约15000字）

【报刊荟萃】

改革开放40年意识形态工作的 历程与经验

储著武 边 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改革开放起步期(1978~1984年),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实现重大转变,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决反对和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全面改革时期(1984~1992年),在全面改革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次泛滥以及“八九”政治风波的发生,对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提出重大挑战。然而,在党领导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拨正意识形态工作航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确保了改革开放在正确轨道上前行。加快推进改革时期(1992~2012年),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来凝聚人心,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全面深化改革时期(2012年至今),党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大力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风清气正的思想舆论氛围。40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基本经验是要做好“四个坚持”,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方

式和方法;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但决不放松对错误思潮的批驳、批判;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2期,原文约12000字)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40年

王 钦 张 奎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主要依靠技术引进提升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具备完整工业体系和一定创新能力的工业大国,工业技术依存度不断降低,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创新水平稳步提升。40年,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走过了四个阶段: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起步、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加速、自主创新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在这四个阶段,工业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政策都持续发生着变化,制度环境和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呈现出共同演进的关系,制度环境变迁表现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体系加速建设和完善;与此同时,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合法性空间,技术引进的重点从设备转变为软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显著增长,创新效率得到提升。纵观40年发展历程,制度环境变化通过确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不断创造创新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激发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工业体制改革确立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了技术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成本;对外开放使得技术创新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速技术创新资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具体来说,就是以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以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对外开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摘自《经济管理》2018年第11期,原题为《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40年: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的共同演进》,约16000字)

中国税制改革 40 年

刘 佐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税制建设也是如此。从时间和内容上来看,1978 年底以后中国税制改革的进程或许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78~1993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即经济转轨时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税制改革的起步阶段,以建立涉外税收制度为起点,继而实行了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制度的全面改革。第二个阶段是 1994~201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税制改革深化的阶段,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新税制。第三个阶段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即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税制改革完善的阶段,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税收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效率提高、分配制度改革和管理工作加强,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从 1978 年的 519.3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44369.9 亿元,增长了 277 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 1978 年的 45.9%、14.2% 提高到 2017 年的 83.6%、17.5%,分别提高了 37.7 个、3.3 个百分点。(摘自《经济研究参考》2018 年第 38 期,原题为《中国税制改革 40 年的简要回顾(1978~2018 年)》,约 16000 字)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 文化市场的关系

曹 光 章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文化市场关系是文化改革发展始终面临的重大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市场在经过激烈争论后逐渐获得承

认。1989 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文化市场管理局,归口管理全国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得到承认。20 世纪 90 年代,“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成为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的原则。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等文化市场部门初步形成,中央、省、地、县、乡五级文化市场管理网络基本形成。2003 年,中央启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有力地重塑了文化市场格局。伴随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应用,还催生了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新媒体、动漫、网游等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又使新兴文化市场进一步细分。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认识和处理政府和文化市场关系坚持了“两点论”: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舆论导向管理、文化市场和文化资本监管,尤其是加强了对新媒体文化市场的管理,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12 月 5 日,原文约 3000 字)

新中国留学归国政策的历史演进

张 俊 莫岳云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 年),党和政府制定的鼓励动员、积极争取、妥善安置政策,为留学生归国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促成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归国潮”。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7 年),留学归国政策以鼓励回国、开展“红专”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为主,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这些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偏离了正确方向,不少归国留学生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 年),是留学归国政策的恢复调整期,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留学归国政策,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氛围,保证了留学归国政策方向的正确性,

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批留学生归国提供了政策保障。改革开放发展时期（1992~2012年），留学归国政策较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创新，“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既适应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又理顺了留学生出国留学与回国做贡献之间的关系；“回国服务与为国服务”的结合，为留学生发挥作用建设祖国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体现了党和政府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的科学思维，留学归国人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进入新时代（2012~），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把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作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积极营造支持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大力引进高、精、尖的海外留学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使他们主动参与到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5期，原题为《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留学归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约12000字）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

吴 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不断调整、完善，从传统的社会管理不断变革为现代的社会治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中国社会治理变革可划分为：与改革开放同行——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变革（1978~1992年）、市场化转轨——从社会行政管理到社会管理的市场化（1992~2002年）、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02~2012年）、共建共治共享——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2012年以来）四个阶段。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围绕“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进行社会治理”，经过40年的社会治理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和国家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治理创新的力度，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提高防范社会风险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社会治安形势持续

好转，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稳步上升，逐步形成了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社会治理体系。（摘自《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原文约12000字）

广东省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

左晓斯 张桂金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正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广东省在经济、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整个广东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升级，从“患寡”到“患不均”；社会结构从“梯形”向“锥形”转变；伴随教育扩张与资源配置不平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不平等”走向“相对公平”；移民的市民化与社会融合，从“排斥”趋向“融合”；社会秩序在社会矛盾调处过程中初步实现由“乱”到“稳”的转变；社会关系历经从“熟人”到“陌生人”再到“半熟人”的转变；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实现从“去组织化”到初步“再组织化”转变。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广东的发展和实践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最生动、最有力的证明，总结广东40年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探索中国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后发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反思市场转型等社会理论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摘自《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原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变迁大趋势：以广东省为例》，约22000字）

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的主要成就

杜 鹏 王永梅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一直属于年轻型人口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了持续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从经济发展水平来

看,我国人均GDP自1978年开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可以说实现了“边老边富”。老年人福祉也因为经济发展、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得到了持续改善,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养老金实现了“十五连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养老服务由补缺型向普惠型发展且内容不断丰富、老年人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等等。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就是我国养老保障全方位、快速发展的最好证明。

从治理本身来看,改革开放40年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取得的成就如下:老龄化认知的科学性逐渐提高,实现了从单一的老年人问题向老龄化社会进而到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转变;治理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飞跃,为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治理能力在法治化的护航下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由被动应付向积极应对转变;治理成本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逐渐降低,为形成高效的中国治理方案积累了宝贵经验。(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原题为《改革开放40年我国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成就、问题与现代化路径》,约12000字)

1949年后我国对西南边防的治理

熊春保 陈长庚

西南边防既包括我国云南、西藏等省市区边境一线的内防,又包括我国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等六国的外防,维护好西南边防的稳定意义重大。1949年后,在解放西南、建设西南近70年的波澜壮阔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西南边防特点,形成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建设理论与策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重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着手,加强西南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通过采取因地制宜变革西南地区军政体制(坚持军事戍边,消灭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区、州、县)、持续推进兴边富民建设(先后进行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三次大规模

的发展建设)、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着力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建立援建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机制、依靠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理有利有节处理边境纠纷(坚持积极稳妥推进西南边境划界工作、为维护领土主权坚决开展边境军事斗争)等举措,西南边防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直接促进了西南边防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确保了西南边防的和平与安宁,为国家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摘自《武陵学刊》2018年第6期,原题为《论1949年后我国对西南边防的治理》,约12000字)

我军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经验

王博洋

改革开放后,在台湾执政当局数次更替、“台独”分裂势力“时隐时现”的过程中,我军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形式、力度不断发展变化,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始终把“使用武力”作为应对“台独”事变的坚强后盾。“和平统一”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奉行的首要方针原则。但是,随着台湾政局的变迁动荡,两岸关系冷热交替、错综复杂,使我们不得不做好以武力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我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时间里,在不同时间段内对台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震慑“台独”势力的目的。

始终把军事斗争准备建立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政治实力、军事能力,将会更大程度震慑“台独”分裂势力,干扰“台独”分裂活动;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文化层次,将会更大程度吸引台湾同胞追求两岸深层次、多领域的经贸合作交流,影响台湾同胞追求两岸和平发展、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诉求与心态。

始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心聚焦在排除外部因素干扰上。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内政,是决不允许别国政府或外来势力干涉和插手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用什么

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显示了我们绝不屈服于国际压力的决心。（摘自《军事历史》2018年第6期，原题为《改革开放后我军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历史演进》，约6000字）

中美建交与亚太秩序革命

牛 军

自1978年以来，亚太地区形成并维持了约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中美战略合作的形成和维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亚太安全秩序革命之年，即基本结束了冷战开始阶段围绕战争和大国对抗而构建起来的对抗性秩序。这期间的关键事件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变革。这一年，中国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发表建交公报，以及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根本性改善并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1978年开启的局面很快促成了维持迄今4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如果比较之前太平洋战争以及之后30年的战争、冲突、对抗等不断的状况，中美建交对新安全秩序的形成有着划时代的积极影响。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建立了特殊和很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开始于1972年2月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被1978年12月中美宣布关系正常化而大幅推向前进。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确认了中美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战略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确信，中美可以在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展开战略性合作。“八一七公报”当时不仅为引发双边关系动荡的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而且为随后深化两国战略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石。（摘自《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原题为《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约15000字）

1953~1955年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梁 志

虽然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但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的中缅关系是冷淡而疏离的。1953年，中国与缅甸的外交政策均出现转向，两国启动经贸往来。次年，由于缅甸政府努力加强同中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政策协调、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周恩来与吴努实现了互访，双方关系迅速转暖。

仔细辨析1953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改善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可以看出中国与缅甸的交往从来就不是在双边框架下运作的，而是在多国互动的广阔舞台上渐次展开的。中国与缅甸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转暖，主要得益于朝鲜战争停战、中印关系改善以及中缅双方外交政策转型。正因如此，缅甸才迫切地希望且有渠道表达对中国政策的忧虑，而中国也急于消除缅甸这一近邻的疑惧，并试图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反过来，中缅关系的明显进展很快成为推动两国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表现为促使中国更加有信心和决心扩大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往来，引导缅甸与苏东国家建立经贸联系甚至政治互信，进而全面推行中立外交。中缅“胞波情谊”的初显使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美缅关系的走势，甚至造就了美国与中国争夺缅甸的局面。

在此过程中，吴努逐渐成为中国与美国跨越太平洋的独特沟通渠道。同样，从某种角度讲，中缅关系的大幅提升还是亚洲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发言权的初始动力之一。（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原题为《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约15000字）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6期要目及摘要

在第十八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欢迎词

于信汇

在第十八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致辞

燕 爽

在第十八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致辞

张星星

正确认识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第十八届国史学术年会学术总结

张星星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以互助组为中心的考察

范连生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西南地区及时引导农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农业生产互助组是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形式。虽然互助组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互助组的成立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1950~1957年的日照渔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李飞龙 厉文姣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渔业合作组织已很难适应持续增产和常年作业的要求，建立新型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成为必然要求。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似，山东日照的渔业合作组织也是按照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逐次推进的。组织起来的渔民展示了集体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扩大渔业生产的要求。

试析中国援外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

张勉励

〔摘要〕援外改革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一项重要实践。援外改革40年的历史是一个渐进式、逐级提升的发展过程，综合考量对外援助改革的政策、援外方式、改革深度等关键因素，可分为以改革援外政策为核心的调整探索阶段（1979~1992年）、以改革援外方式为核心的重大转变阶段（1993~1999年）、以融入国家开放战略为核心的全面发展阶段（2000~2009年）和以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为核心的深入发展阶段（2010年以来）四个时期。各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比较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历程与经验

周艳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94年是体制变迁带动下的大幅减贫；1994~2000年是扶贫攻坚带动下的开发式扶贫；2001~2012年是小康社会建设视域下的农村扶贫开发；2012年以来是精准扶贫视域下的扶贫攻坚。从这一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经验：一是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坚持与时俱进的基本理念不动摇；二是要处理好阶段性与长期性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体；三是要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将“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提到农村扶贫政策的重要位置；四是要处理好自扶与他扶的关系，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现自我脱贫；五是要处理好“大水漫灌”、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在扶贫实力增强、扶贫质量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扶贫模式的精准化、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街道妇代会与基层民主建政——以湖南长沙为例

尹红群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街道妇女代表会议是城市街道政权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积极参与街道民主建政的重要群众团体组织，并在民主建政中完成了自身的组织构建和整顿。组织起来的妇女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政议政，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在城市基层民主建政的过程中，街道妇女代表会议的作用、角色与职能定位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山西率先发起学大寨运动的初始目的、运作方略与实际效果考论

李静萍

〔摘要〕1963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发起了学大寨运动。山西在开展学大寨运动之初就确立了符合本省实际的思路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诸如坚持因地制宜、支持各地树立“本地大寨”、推行“一带二”的方法，以及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倡导农业技术改革、发展多种经营等。这些措施有效保证了山西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也实现了中共山西省委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粮食增产的初衷。

1956年上海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关系研究

刘岸冰

〔摘要〕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企业治理结构实现变革，其变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重建企业内部结构，即调整企业内部公私管理人员的配置。根据中央“量才使用辅以必要照顾”的总方针，资方原有管理层的人员大部分在合营企业得以适当安置。然而，在合营企业内部，公私关系却因双方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经营管理方法的分歧等因素而导致诸多问题。针对这些状况，上海市政府采取了对资方加强政策教育、明确公私方权责与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加强交流与实行民主监督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私关系。

1963~1966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经费初探

易海涛

〔摘要〕1963~1966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了近十万名上海知识青年。安置如此数量庞大的知识青年所需经费颇巨，需要中央和地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在制订经费预算时已经涵盖了知识青年安置的方方面面，为解决安置问题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但由于被安置人员数量大、花费多，加之中央和地方财力紧张、物资短缺，因此在实际支出中难免捉襟见肘。通过一系列准备、调整、调配等工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与上海相互协作，动员团场职工与上海知识青年发扬团结互助、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最终克服了安置经费不足的困难，从而保证了安置工作的最终落实。

苏联援建中国人民海军述论（1949~1960年）

孙泽学 贺怀锴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海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援助。斯大林曾允诺帮助中国建设海军，虽然受朝鲜战争的影响，苏联对华海军援助较少，但对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及保卫中国海疆安全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六四协定”和“二四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海军装备及技术援助，加上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时移交的海军装备，使中国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50年代，苏联还派遣了海军专家顾问援华，对中国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人民海军的建设始终坚持自主发展与接受苏联援助相结合的方针，为此后人民海军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20年来第一次全国普选研究综述

金子求

〔摘要〕近20年来关于第一次全国普选的研究逐步引起学界关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或从宏观角度进行整体考察，或是对某一地区普选的过程及其某一侧面进行探讨，而较少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及中共在过渡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普选的影响这一角度考察各地开展基层选举的具体情况。关于第一次全国普选的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如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普选关系的研究、1953年《选举法》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选举法的比较研究、各级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与职能考察、各阶层选举权落实过程中的真实面相、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